

憶列寧



蔡特金著

胡仲持譯



MG
A732
4

金特蔡 · 賴拉加國德

寧 列 憶

譯 持 仲 胡

店 書 林 珠

號六十里安人路嶺牯海上

1 9 3 9



3 1764 1612 5

目次

序	七
黨務會議	九
文化和革命	一五
波蘭戰爭	三三
『德國問題』	四四
第四屆世界大會	五七
婦女、婚姻和性問題	六六

47124

549.4022
563

插圖目次

插圖目次

列寧石像（在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岸邊）	封面
列寧畫像（I·勃洛茨基作）	九
克里姆林大廳舉行中央執委會全體大會	三
列寧在書齋中	三
一九一八年列寧在電報房接收情報	三
列寧跟同志們談話	三
本書著者克拉賴·蔡特金	三
第四屆國際婦女大會	三
女黨員在農村演講	三

列寧夫人 N·K·克魯普斯卡亞	五七
列寧之妹瑪麗·伊劉尼雪那學習攝影	五八
中年時代的列寧夫人	五九
馬克思和恩格斯造像	六一
列寧造像（N·安特列夫作）	六二
列寧在病中	六三
列寧墓	六四
岩石鑿成的列寧像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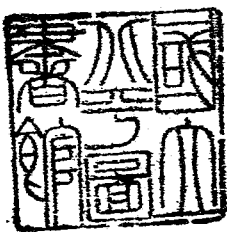
序

當我們各自懷着最深切的哀愁，體會到我們受着無可補償的損失這一種悲悼的時候，關於一個從大領袖的地位顯出偉人本色來的人物的憶念不由得浮上了腦際。當作領袖也罷，當作平常的人也罷，偉大這一種神韻總是深印于列寧的形貌，而且「使他永遠寄寓在全世界無產者廣大的心頭」的——這一種光榮的運命，是馬克思曾經劃歸於巴黎公社的鬥士們的。因為勞動者們，那些爲富人而受着犧牲的，那些有如休謨詩上的加拿大人一般，不明白「舊世界的表面文明」——我們可以補充一句，不明白布爾喬亞世界因襲的詐欺和偽善的勞動者們，現在用了精細的本能感辨得清「純正」和「虛偽」，真正的「偉大」和神氣活現的「自負」，無私的「博愛」和僅僅反映着虛榮心的「求名的欲望」了。

我知道把私人事件送到公衆的眼前是極不容易的事。然而我卻感覺着：把我個人對於我們不能忘掉的領袖和朋友的珍貴的回憶，提出多少精華來發表，實在是我的義務。是我對於他的義務，因為他在理論上行動上指教我們。凡是就歷史看來，必要的新發展的事，是可以由革命意志有意識地來造成的。又是我對於他所深愛，他爲之工作的人們的義務：這就是世界的無產者，創造者，被剝削被壓迫者——爲了他們的苦難，他的心裏充滿着同情；而且在他們中間，他得意洋洋地物色了許多革命戰士，更高的社會秩序的建造者呢。

C·蔡特金一九二四年一月

黨 務 會 議



自從「震驚世界」的俄國革命爆發以後，我第一次跟列寧從新會面是在一九二〇年的初秋。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我初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的斯浮特洛甫堂出席黨務會議的時候。在我看來，列寧的丰姿沒有怎麼改變，也不見得老了多少。我可以賭咒說，他穿的那套整潔的西服正是我初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就穿着的。那是在一九〇七年斯都德茹德（Stuttgart）世界第二國際大會的會場，當時具有藝術家賞識人物的慧眼的羅撒·盧森堡（註）指着列寧對我說道：「仔細瞧一瞧他。這就是列寧。你瞧那個執拗的剛強的頭腦。一個真正俄羅斯人的頭腦，帶着幾條隱隱約約的亞

（註）羅撒·盧森堡（Rosa Luxemburg 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德國女革命家。一九一九年一月

因共產主義革命失敗被殺。著作很多。

細亞式的皺紋。那個人簡直想掀倒了山嶽呢！或者山嶽壓下來壓得他粉碎也難說。而他永遠是不屈服的。」

列寧的姿態和神情正同先前一樣。他的論辯往往很生動，甚至也可以說很驚人。正同先前出席第二國際歷屆大會的時候一樣，列寧超越於任何人的地方就在他那聚精會神的觀察以及始終如一的對於議程的注意，他那富於自信力的沈着態度，推誠相與似的懇摯的交際手腕以及剛柔並濟的活動能力。

這一切顯現於他在會議時候間或發表的幾句意見以及登台發表的長時間的演說。他那銳敏的眼光，他那明澈的語句沒有一點不值得注意。在會議時間——以及其後——我感覺到列寧的性格的主要特徵是單純和真摯，是對待一切同志完全出於自然的神情。我所以說「出於自然」因為我深深地感覺着要這個人弄什麼玄虛是辦不到的。他對待同志們的神情正是他的性格的自然的表現。

列寧是黨的天生的領袖。這個黨，在其目的及其求達目的的手段上表現得明明白白，是領導工農奪取政權的鬥爭的；這個黨得到了工農的信仰的支持，現在正由無產階級獨裁控制着。就在須要個人擔當獨裁的時間，列寧做着「大帝國」的領袖和創造者，這個「大帝國」已經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了。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存活在無數的人們心中，甚而至於在蘇聯國外。他對於各種重要決議案的意見全都有着權威；在受剝削受壓迫的人們所住居的各地，他的名兒就是希望和自由的象徵。「列寧同志領導我們走向共產主義，無論怎樣的困難，我們總得堅持下去，」俄國的工人們這麼聲明着；他們不是爲了理想的人類福利的憧憬，不管凍餒，奔往前線去，就是在說不盡的困難之下爲重建工業而工作。「我們何必害怕老主人們回來奪取我們的田地呢？列寧小爹和紅軍會營救我們的。」農民心裏這麼想。甚至在意大利，有幾個教堂的牆頭上也寫着「列寧萬歲！」這句話表明着有些工人的熱烈的頌讚，——他們就俄國的革命，迎候着求「自身的自由」的起鬪。在美洲，在日本，在印度，反抗資

本家的奴役權的叛徒們也都在列寧的名號之下聚集起來。

列寧——現在因其偉大的歷史功蹟，本已可以躊躇滿志，但還抱着堅定不移的信仰，負着最嚴重的責任，拼命地工作着的列寧，他的姿態是多麼單純多麼謙虛呵！他在同志們的隊伍中間失去了他自己，他是他們的同行者，是許多人中間的一個。他從不打算用什麼姿勢什麼行動擺出「個性」來。這麼着在他是不慣的，因為他有的是真正的「個性」。勤務兵們不住地帶着政軍各機關的報告進來，他往往用匆促寫成的幾行來批答這些報告。列寧對誰都有友善的微笑，或友善的點頭，從喜氣洋洋的臉龐上顯現出來。但是在會議期間，他跟領導的同志們滔滔的論辯可就不免驚動四座了。會議前後，列寧總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標。從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遠遠的各個工農運動中心來的男女同志們，青年們，許多青年們大家圍着他。「弗拉地彌爾·伊里奇（註）請你……」「列寧同志，不要推卻罷……」「伊里奇，這我們知道……但是……」

（註）列寧本名是弗拉地彌爾·伊里奇·耶梁諾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

！』這樣的要求呀，問題呀，提議呀向他纏個不清。

在傾聽着回答着的當兒，列寧顯出娓娓不倦的沈着的耐性來。關於黨的一切問題，關於個人的種種愁苦，他都用心聽着，並且作着適當的指導。他對待青年的態度特別好。沒有絲毫倚老賣老的習氣，列寧一舉一動都顯得自己跟青年們平等；他的心每一纖維都是跟青年們相維繫的。他的態度上也找不出一點「大人先生」的形跡來；他在黨中所享有的權威正是「理想的父親」的權威；大家所以承認他的優越，因為大家覺着他是理會大家的心意而且希望大家理會他的心意的。從這一種包圍着列寧的空氣裏，我禁不住黯然地聯想起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父」的神氣活現的威風來。尤其是那個布爾喬亞共和國總統，社會民主黨的愛勃脫（註）細心研究着上流階級「咳嗽吐痰」的禮貌，這一種可鄙的奴隸根性已經把無產階級歷史的榮譽以

（註）愛勃脫（Friedrich Ebert）（一八七一——一九二五）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德意志共和

國第一任總統。工人出身，曾任社會民主黨領袖，當選為總統以後，就退出該黨。

及人的尊嚴全都丟掉了。我們姑且說這批紳士決不像列寧那樣「默然到想要造成革命」罷。而且在他們看護之下，資本家們目前是能夠在「羅馬帝國發祥地」安穩地睡着覺，甚而至於比在海涅（註）時代三十三個君主統治之下還睡得安穩的罷。可是，從歷史的發展和需要的激流，終究免不了有革命起來，而這裏的社會也會雷轟似的叫一聲：「要你的命」的！

（註）海涅（Heinrich Heine 1799—1856）是德國大眾詩人。在他的時代，歐洲三十餘

小國組成了日耳曼聯邦，由梅特涅主持着。

文化和革命

我第一次訪問了列寧的家庭，我在黨務會議所獲得的印象加強起來，從此以後，我常常跟他談話，這就使那個印象一發深刻了。列寧住在前俄皇的行宮克里姆林，有人要去看他必須經過許多道守衛隊的崗位，這是事實——當時還有反革命分子打算陷害革命的領袖們，因此這一種戒備是理所當然的。

列寧遇有必要的時候還在國務院見客。然而他的私生活卻極其簡單極其率真。我到過幾個工人的家庭，其中的設備比起這位「操有全權的莫斯科獨裁者」的家庭來，就富麗得多。我曾經看到列寧的太太和妹子在吃晚飯，那時候他們當即殷切地叫我一同吃。這是簡單的晚餐，適應着國難時期的需要：茶，黑麵包，牛油，乳酪。過後那妹子要爲我這個「貴客」找些「甜甜的東西」來，便尋到了一個小小的糖菓瓶。大家

知道農民們曾經把白麵粉、牛肉、雞蛋、水菓等等禮物送給「他們的伊里奇」，可是什麼也沒有留在列寧的家里。一切都轉到醫院和托兒所去了；列寧的家庭嚴守着不比別人，不比勞動大眾享用得好這一個原則。

自從一九一五年二月百倫城（Berne）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開會以後，我不會跟列寧的太太，克魯普斯卡亞（註）碰過面。她那和善的臉龐，暖洋洋的友愛的眼

（註）納台許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亞（Krupskaya 一八六九——一九三九）一八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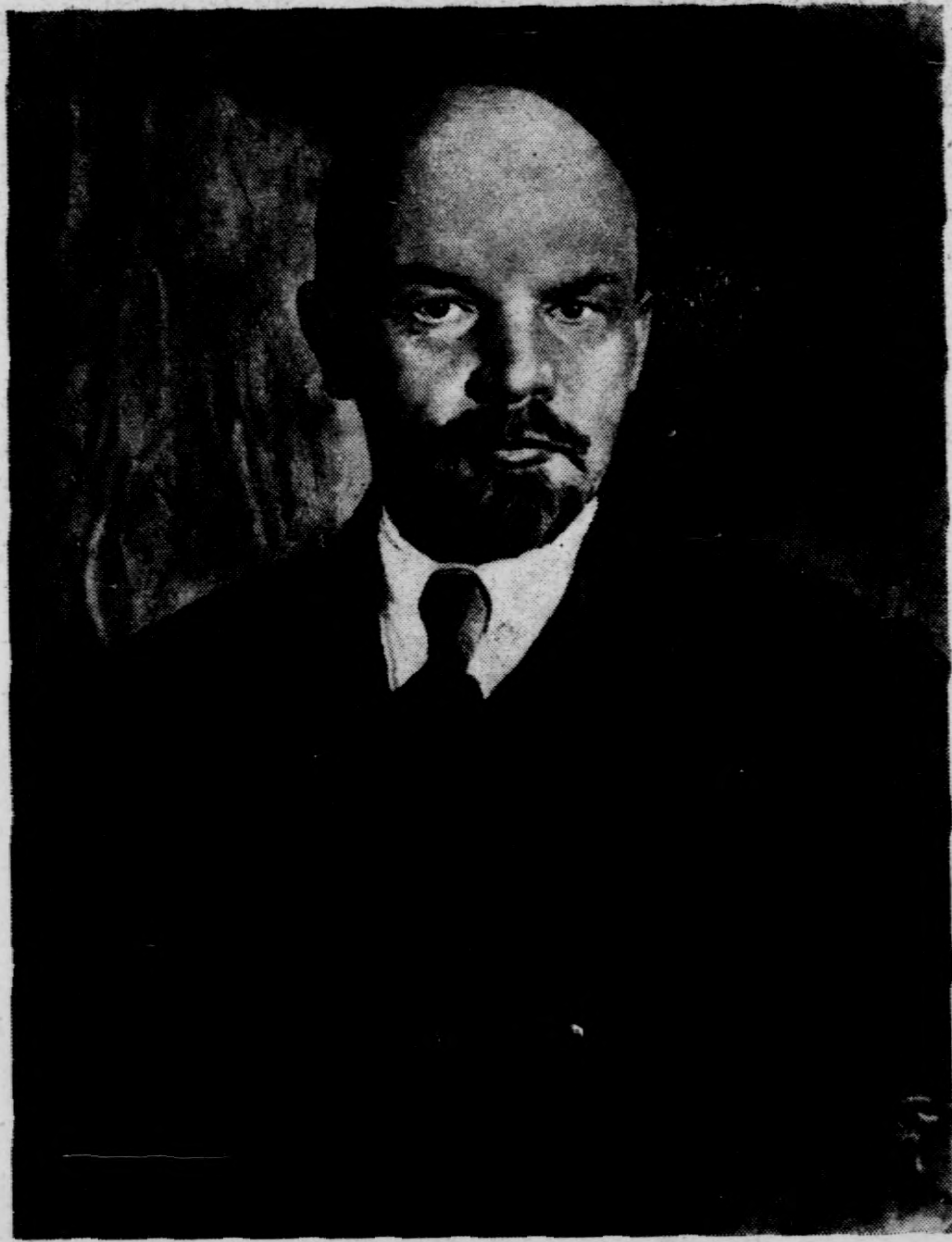
年開始在學生讀書會中研究馬克思及恩格斯學說，積極參加馬克思主義秘密會社之工作，嗣後加入列寧於一八九三年在聖彼得堡組織之「工人階級解放同盟」。在此初期共同鬥爭之歲月中，她即與列寧十分密切。一八九五年列寧被帝俄政府逮捕後，她曾設法組織列寧與其他未被捕各會員間之聯絡關係。次年她亦被捕，經監禁七個月後，被判三年流刑。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間，她與列寧同居於西比利亞，列寧流刑期滿出國後，她單獨被流徙于烏發省者又一年。一九〇一年，她赴明興（慕尼黑）因列寧時在該處為《火星報》及《時代報》工作，一九〇五年十月與列寧同返聖彼得堡，積極

睛，帶着侵蝕了她的青春的疾病的表記。然而除此以外，她卻還同先前一樣，顯得是眞誠和謙虛的化身，清教徒似的淳樸的化身。她的頭髮滑澤澤地梳向後面，打有一個草率的髻，她的衣服顯得並不稱身，看去好像一個忙亂的家主婆，一味想念着節省時間爭取時間的。這位「大俄羅斯帝國第一個太太」——依照着布爾喬亞的觀念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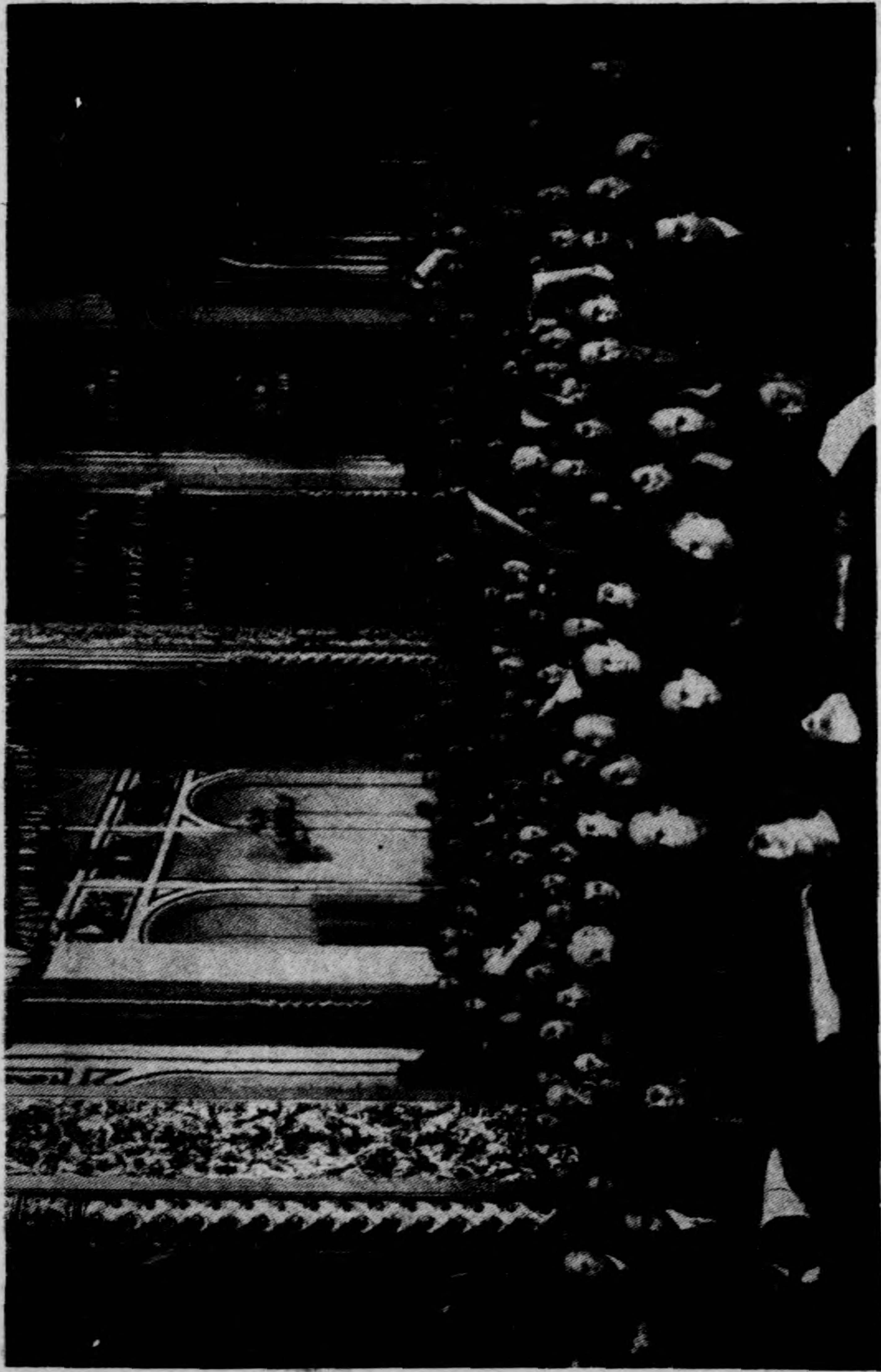
參加革命，革命失敗後，她赴芬蘭，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斯托克荷姆代表大會籌備及會議工作，一九〇七年列寧與她共同移居日內瓦，一九〇八年同居巴黎，一九一一年她在巴黎近郊朗麥敵地方列寧組織之黨校工作，一九一二年二人遷居克拉科（波蘭），在該處女士經常與俄國境內布爾雪維克組織通訊。一九一五年她代表出席維也納國際婦女大會。世界大戰開始時，列寧在奧匈帝國被捕，經女士努力營救方得釋出。一九一六年二月，二人同往蘇里支（瑞士）居住。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同返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她曾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工作。人民公共教育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成立後，她即爲該委員會評議會員。一九二九年起她任俄羅斯邦人民教育副委員長，其後又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兼蘇聯最高議會議主席團委員。因從事大眾教育勞績卓著，曾經頒授列寧勳章及勞動紅旗勳章。

語來說——在願意忘掉自己，為勞動者和被壓迫者的解放而犧牲這幾種德性上，無疑地可以算得第一個了。她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一輩子跟列寧共嘗着甘苦。講起他來，要想不到她是不可能的。她是「列寧的右手」，他最好的首席的書記，他思想上最貼心的同志，他最有經驗的代言人兼他的意見的解釋者。例如她在工人階級中間進行着宣傳，給這位具有力與智慧的天才的導師不倦地爭取朋友和羣衆的時候。除此以外，她還有着她私人的活動，即民衆教育和民衆訓練，這是她自己用全副心力來幹的。

假如說克魯普斯卡亞是在克里姆林的「列寧的代表」，這就顯得滑稽而且跡近侮辱了。同向來的情形，甚至於同他們兩人因受放逐和極大的迫害而彼此分離的時期一樣，她爲他而工作，爲他而操心。她那深厚的母親樣的本性使列寧所居住的「家」成爲具有最優美的意味的「家」，而在這個「家」裏，他的妹子又給以親切的幫助。這一個家，並不是德國俗人們心目中那樣的家；在這裡充滿着仁愛的情調，把當地活動的人們聯結起來。不消說，在那樣的情調中間，一切是真誠——是真理，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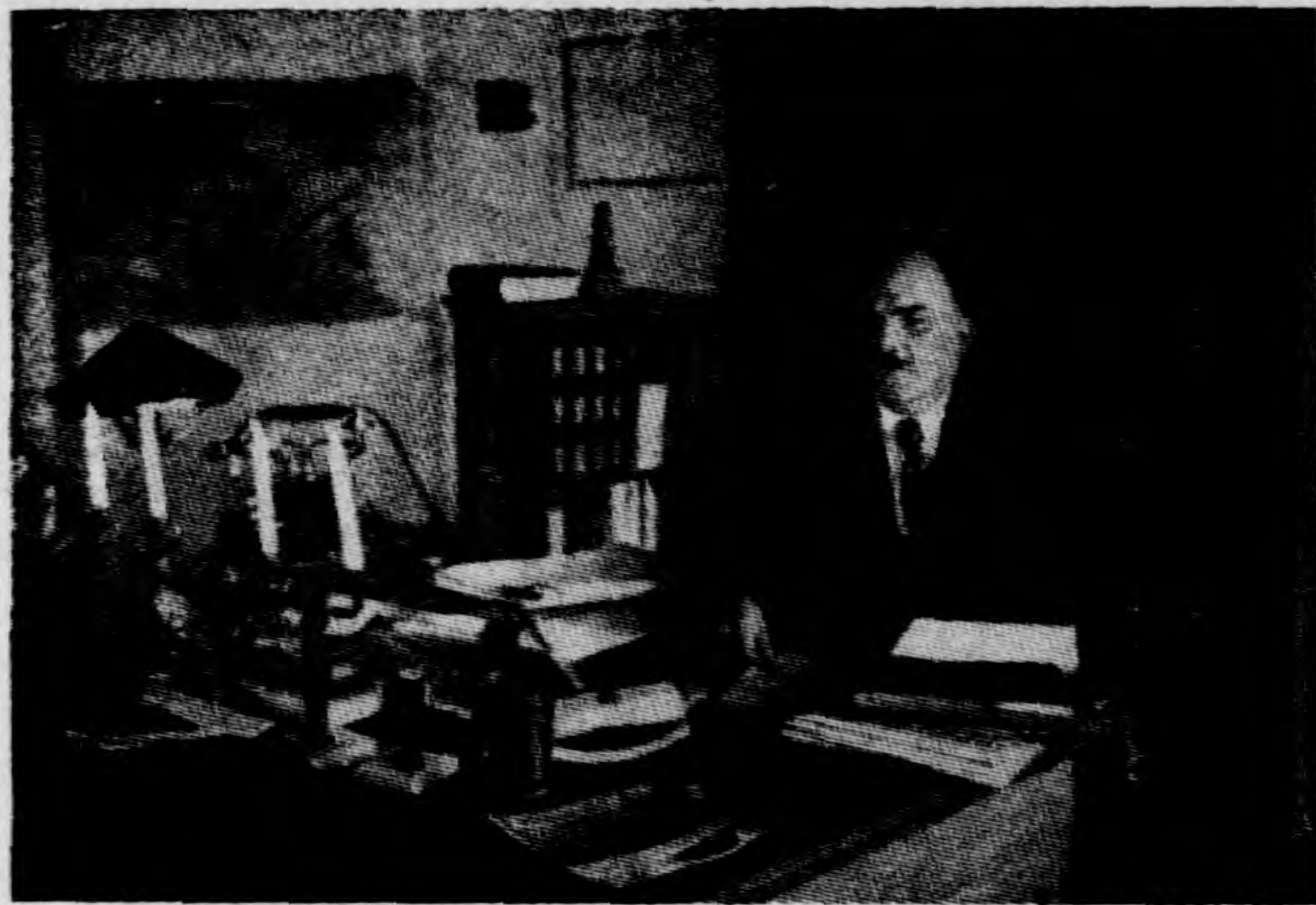


(作基茨洛勃·I) 像畫寧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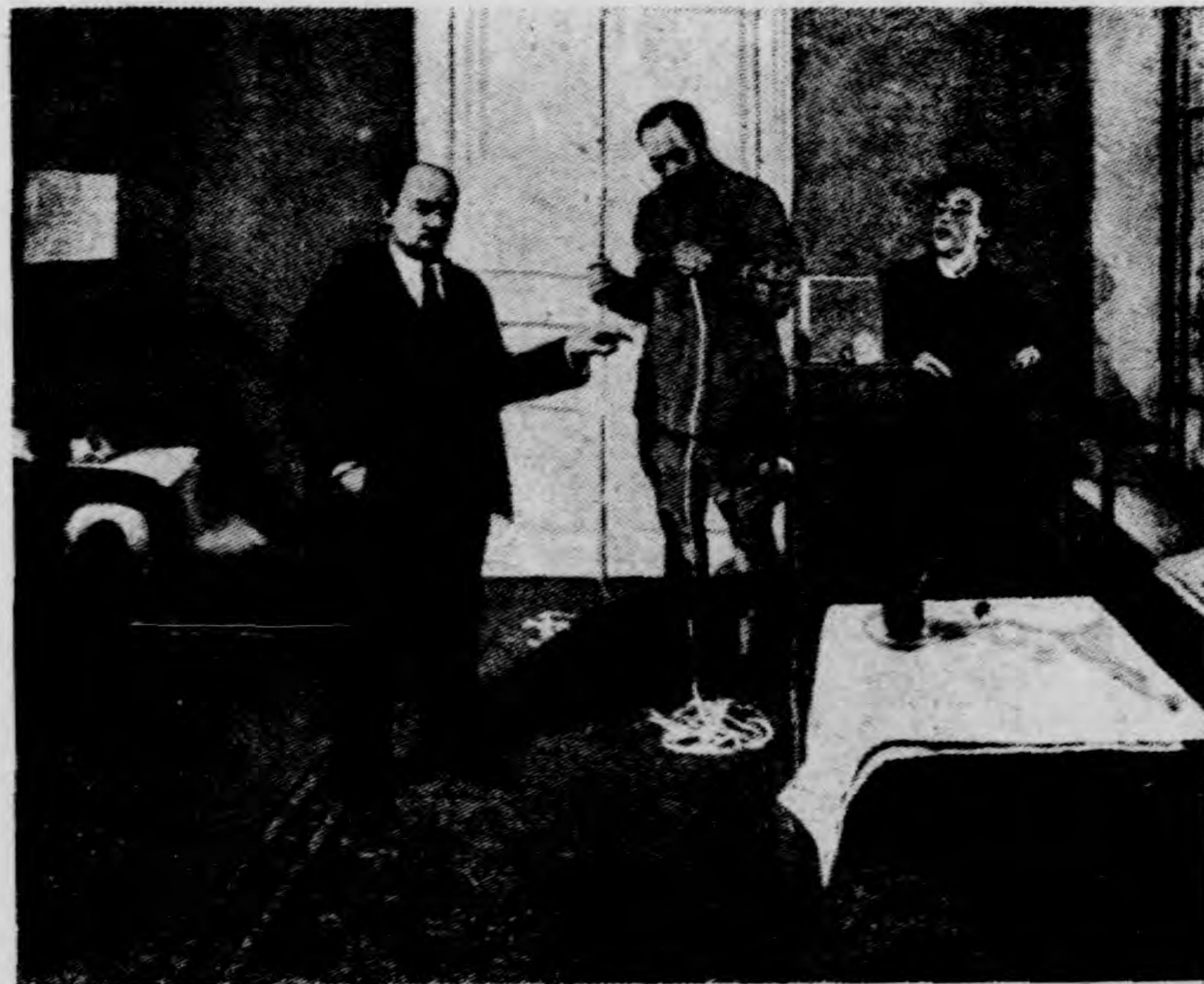


會大體全會委執央中行舉廳大林姆里克

(言發筒聲攢製紙用員委分部一)



中齋書在寧列



報情接收房報電在寧列年八一九一



列寧同志們談話

和尊嚴所決定的。雖然我個人在當時跟克魯普斯卡亞同志並不見得多大熟識，可是在她的「王國」中間，在她友愛的關顧之下，我不一會可就覺得同在家鄉一樣舒服了。等到列寧進來，過了些時，一隻大貓出現了，大家很開心地看他跳上這位「恐怖黨領袖」的肩頭，終於在他大腿上安頓下來，那時候我真的要淌下眼淚來，爲的是我覺得彷彿身在祖國，彷彿同羅撒·盧森堡和她的貓「咪咪」——她的「朋友」中間一個令人難忘的「人格化身」——在一塊兒了。

列寧見到我們三個婦女討論着藝術以及教育和訓練這些問題。我就布爾雪維克的巨大的文化工作，那些開拓着藝術和教育的境界的各種創造力的成績和活動，表白了一番熱烈的欽佩。然而我卻也沒有掩飾一個印象，我以爲這方面顯然也有不堅定、不清楚、因循的、試驗的種種現象，而文化生活上對於新內容新形式、新路線的熱切的要求也還跟許多模倣西洋典型的矯揉的文化的習尚糾纏在一起。列寧當即很起勁地來參加討論了。

『大眾的覺醒，各種力的活動可以創造出蘇俄的新藝術和新文化來，』他說。『是好的，很好的。這一種飛躍的發展是有用而且可以理解的。幾百年來所忽略的一切，我們必須加以補足，我們要加以補足。混亂的醞釀狀態，對於新解決和新口號的熱切的尋求，今天讚揚某種藝術的精神傾向，而明天給牠「上十字架」——這一切是無可避免的。』

『革命使一向受着箝制的一切力量獲了解放，把牠們從深處趕到表面。舉一個例子來說罷。你想沙皇宮廷的習尚和風氣加在我們繪畫彫刻和建築的發展上的壓力怎麼樣，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趣味和幻想怎麼樣。在私有財產打根底的社會裏，藝術家是爲市場而生產出品的，他需要着購買者。我們的革命把藝術家身上這一種最掃興的事態的壓力扔掉了。革命使蘇維埃國家成了他們的保護者，獎勵者。凡是藝術家，凡是想要照着自己的理想來自由創造，不問結果是好是壞的人們都能夠要求他們這一種權利。因此你就見到醞釀狀態試驗狀態和混亂狀態了。』

「但是，不消說，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不應當把兩手插在衣袋裏，任憑混亂狀態隨意地發着酵。我們必須設法來指導這一種發展，來形成來決定牠的結果。就這上頭來說，我們還做得不夠，大大的不夠。在我看來，我們也有着我們的卡爾斯太特德博士。（註）我們「偶像破壞者」是太多了。譬如美的東西——那怕牠是老舊了，我們應當保留牠，緊緊地守住牠。何必光因為「老舊」的緣故，丟開了真正美的東西，而且作為進一步發展的起點，壓根兒棄掉牠呢？何必光因為「新」的緣故，把新的東西當作大家應當服從的上帝似的來崇拜呢？這是無意識的事，純粹無意識的事。這中間也有不少習慣了的藝術上的偽善性，也有不少對於西方藝術體裁的追從性。不消說，出於無意的，我們是優良的革命者，可是我們感覺着不得不指出我們是站在「當代文化

（註）卡爾斯太特德博士，A. B. Karstadt [四八〇——一五四一] 德國宗教改革運動者。本是路德的門徒，後來流於過激，企圖澈底推翻修道院制及天主教會儀式，而為路德所反對，終於出亡南德意志。

的峯巔。」我有着勇氣來暴露我自己是「土佬兒」。我不能把表現派未來派立體派以及什麼什麼派當作藝術天才的最高表現來珍賞。我並不懂得這些。這些也沒有給我什麼愉快。」

我不得不承認鼻子的藝術形式在熱情的人們看來應當是一個三角形，而革命的實際力量應當把人體變成不成樣子的一個口袋，裝上兩隻鸞鷲腳或是兩把五個尖頭的叉兒，我自己對於這種道理也缺少着理解的能力。列寧哈哈大笑。『是呵，克拉賴，我們兩人是老了。我們在革命中間姑且再做多少時候的青年罷。我們再也懂得新藝術了，我們正在這後面蹣跚着腳走呢。』

『但是，』列寧接下去說，『我們對於藝術的意見卻並不重要。在我們這麼大的人口中間，藝術給予幾百個，甚至於幾千個人們怎樣的意義也是並不重要的。藝術是人民所有的。這必須在廣大的工人大眾中間有着極深的根苗才好。這必須生根在那里，而跟他們的感情、思想和欲望一同成長。這必須使他們中間有藝術家產生而且

發展。當工農大眾還缺少着黑麪包的時候，難道我們可以拿糕餅和糖給少數人吃的麼？我這句話不但是就表面的意義說，還是個比喻的說法。我們必須老是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前，我們必須研究着爲他們打算爲他們設法。雖在藝術和文化的範圍裏也得這麼辦。

「這麼着，藝術才可以接近大眾，大眾才可以接近藝術；首先第一，我們必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準。在這方面，我國的情形怎麼樣呢？自從奪得了政權以後，我們所成就的艱巨的文化工作，是少不得使你驚奇的。我們不是吹牛，我們在這方面做了許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我們不但如孟雪維克黨，和他們在各國的黨徒考茨基（註）之流所攻訐，斫着人們的頭顱，我們還教育着人們的頭顱，許多人們的頭顱。然而所謂「許多」卻只是跟過去，跟當時據有權位的各階級各黨派的罪惡相比較罷。

（註）考茨基（K. J. Kautsky 一八五四——）德國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期，曾爲了

反對無產階級獨裁論，與列寧有過論爭。

了我們對付不了工人和農民對於教育和文化的巨大的需要，這些需要是我們所喚醒所激發的。不但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各工業都市，而且在這些都市以外，在鄉村中間。我們是窮苦的國家，叫化子的國家，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大多數老百姓在文化上總依然是弱者。是文盲。不消說，識字運動我們正在加緊地進行。小市鎮和小鄉村的圖書館和「讀書處」我們也正在開辦。我們組織着各種性質的補習學校。我們辦很好的劇團和音樂隊，我們派「教育組」和「巡迴展覽組」到全國各地去。但是我要再說一句，這一切對於缺少着最基本的知識，缺少着最粗淺的文化的成千萬的人們怎麼樣呢？今日的莫斯科一方面有一兩萬人欣賞着壯麗的演劇，另一方面則有成千萬人叫喊着要學習文字的拚法，姓名的寫法，數目的計算法；他們要求着文化，他們急着要學習，因為他們剛剛懂得宇宙是自然法則所統治，不是「天父」以及他的巫妖們所統治的呢。」

『不要這樣起勁地給文盲嘆苦罷，列寧同志，』我插嘴說。『文盲委實是少

些幫助着革命前進的工人和農民因爲是文盲的緣故，才免得給布爾喬亞的思想和概念阻撓了毒害了他們的心意。你的宣傳和煽動正落在處女地呢。在沒有滿地的森林要你首先去斫伐的地方，來播種來收割可不是比較的容易麼？

『唔，這是對的，』列寧回答道。『然而也只有在某種限度之內，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只有在我們的鬥爭的某一階段才對。對於因舊的國家機構有破壞的必要而奪取政權的鬥爭，文盲狀態是可以適應的。但是我們難道單是爲破壞而破壞的麼？我們破壞着，爲的是要建造更好的。文盲狀態對於建設事業是不能適應的。馬克斯說過：建設事業必須是工人用以解放自身的事業才好，我要補充一句，不但是工人，還有農民。我們的蘇維埃社會使這句話可能實現了。現在各蘇維埃，各蘇維埃團體中間，成萬的工人正在學習建設的工作。他們是「血氣方剛」的男女，這是他們對你們外國人常說的話。這意思就是他們大都是從舊制度，即從無教育無文化的制度中間長成的。現在他們熱切地追求着教育和文化了。我們盡着我們的力量把新的男男女女拉進到

蘇維埃的事業裏，這樣的給與他們實際的理論的訓練。行政上建設上人才的缺乏，是無可掩飾的事。我們不得不引用舊式的官僚，因而我們不免要落到新的官僚制度了。這是我所十分痛恨的。官僚個人，他是一個幹練的流氓也罷，我還不怎麼痛恨他。我所痛恨的卻是官僚制度。這是徹頭徹尾麻木的腐敗的東西。要克服要剷除官僚制度，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儘量普遍的民衆教育和民衆訓練。

「我們對於前途的展望怎麼樣呢？我們設立着完美的教育機關，進行着的確很好的步驟，使無產者和農村青年能夠學習，研究，接受文化。但是這裏又要引起可惱的問題來了：在那麼多的民衆中間，這一點兒成績算得什麼呢？還有更要不得的！我們所辦的幼稚園，托兒所和初級小學，數量實在是太少太少了。成百萬的孩子們逐漸的長成起來，受不到教育，受不到訓練。他們的父親和祖先一向接受不到什麼文化，他們也就在無知狀態里生長着。有好多的天才要糟蹋，有好多的人們要失望呵！這是違反着青年世代的福利的殘酷罪孽，這是蘇維埃國家的「強盜式行徑」，而蘇維埃是要發

展成爲共產社會的。這是前途的嚴重的危險。」

在通常沈靜的列寧的聲音裏，有一種帶怒的咆哮了。這問題居然引得他對我們三人作了一大篇演講，這一定是使他非常感慨，非常苦悶的，我心裏想。我們中間有一個——記不得是誰了——講了幾句話，說藝術界和文藝界所顯現的種種特徵有許多是「情有可原的。」她就用當時的情勢作了一番解釋。列寧回答道：

「這我知道！許多人老老實實地相信着此刻的困難和危險是可以利用「麪包和馬戲」來克除的。麪包——當然要馬戲呢——並不錯！但是我們卻不該忘記馬戲並不是偉大的真正的藝術，不過是多少好頭的娛樂。要知道我們的工人和農民比不得羅馬時代的暴民了。他們不是由國家來養活，他們也沒有用工作來維持國家。他們造成了革命，他們用了無比的犧牲，用了無數的鮮血來保衛這一個事業。我們的工人和農民所應當享受的確乎不止是馬戲。他們有要求真正的偉大藝術的權利。因此擺在其他一切前頭的是普遍的民衆教育和民衆訓練。這些就是文化的土壤——假如說

麪包沒有問題罷——這上頭會長出真正新的偉大的藝術，共產主義的藝術來，而形式是要跟着內容來安排的。我們的「知識分子」面對着極有價值的艱巨的事業。那些事業的認識和實行就是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貢獻，因為這也就是給他們大開了通到自由之境的門戶，使他們得以脫離舊時生活條件所造成的悲慘狀態，像「共產黨宣言」上那麼深刻地描寫着似的。」

那一晚——已經是深晚了——我們談了許多事情。但是除了列寧所談關於藝術、文化、民衆教育和民衆訓練的話以外，旁的卻全都從我的記憶上消隱了。當我在那冷簌簌的晚上走回家去的時候，我心裏想，他是多麼懇切多麼熱烈地愛着勞動人民呵。可是有一批人，卻還以為這個人是冷酷的理智的機械，是嚴肅的狂人，只會依照着「歷史的範疇」來認識人類，而且把人類彷彿當作九柱戲的木柱似的估量着玩弄着的呢。

波蘭戰爭

又有一次跟列寧的談話深印在我的記憶裏至今沒有磨滅。正同當時從西歐到莫斯科來的許多人一樣，我爲了生活狀態的改變也不得不嘗些兒苦味，不得不躺在牀上生病。列寧來看我了。好像最慈愛的母親似的，他焦急地問着我有沒有得到適當的調養，好好的醫治之類，問着我可需要什么東西麼。在他的後面，我看見克魯普斯卡亞的和善的臉龐。當我說一切稱心的時候，列寧對我懷疑了。尤其使他不過意的事情就是我那時住在蘇維埃大廈的四樓，這大廈在理論上是有着升降梯的，可是實際上升降梯却沒有開動。『正像是考茨基他們對於革命的欲望和意志呀，』他諷刺似的說。不一會，談話的「小舟」泛到革命的河流裏去了。

紅軍從波蘭撤退這一件事情好像初霜一般，少不得使我們的思想所栽培的革

命的花褪了色，這朵花當蘇維埃軍隊經過了又勇敢又急速的一次進攻，已經到達華沙的時候開得多麼好啊。我向列寧敘述了一番：這一件事情對於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以及雪特曼和狄德曼他們，(註)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發生着怎樣的影響，正當「同志們」戴着綴有蘇維埃星章的帽子，穿着破舊不堪的制服和便服，踏着草鞋或是破皮靴，鞭着活潑的小馬直奔向德國邊界去的時候。「他們會不會維持着波蘭的佔領而且越過邊境呢，到那時候怎麼樣呢？」這是當時打擾着德國一般人心理的問題，爲要解答這問題，酒排間裏的政略家們當時不住地劇烈爭辯着。各階級各社會階層對於自衛軍的，帝國主義的波蘭顯然比對「傳統的敵國」法蘭西更其有着國家主義的憤慨。然而較之這一種國家主義的對於波蘭的憤慨更強烈，較之對於

(註) 雪特曼 P. Scheidemann [八六三——] 德國社會民主黨員。一九一九年共和政府首相。狄德

曼 Wilhelm Dittman [八七四——] 德國木匠出身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共和政

府部長。一九二二年獨立社會黨首領。

凡爾賽條約的神聖的尊重心更迫切的情感却是對於革命前景的憂懼。面對着這一種危險，便有雄辯的愛國主義和溫情的和平主義慢慢兒露臉了。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連同從工人階級轉過去的他們改良主義的徒黨對於波蘭事件的繼續發展是半喜半懼地加以觀察的。

我就這個問題所說的話，我對於共產黨的地位，對於改良主義派和個別的工會領袖的地位所發表的意見，列寧都一心一意地聽着。他在沈思狀態中間默默地坐了幾分鐘。『是呵，』他最後說道，『波蘭有着這樣的事情，大約是勢所必然的。你當然知道那邊進行着的一切情形，我們太過勇敢的忠實的先鋒隊在兵力上軍需上都沒有相當的接濟，有時候甚至得不到乾麪包吃。他們只好從波蘭的農民和中等階級那里來徵發麪包和旁的必需品。於是波蘭人對於紅軍並不看做同胞，看做解放者，倒看做敵人了。他們的感想和行動沒有遵循社會的革命的路线，倒同國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一致了。我們所估計到的波蘭革命沒有發生。工人和農民受了畢蘇斯基和達尋斯

基(註一)的徒黨們的欺騙，保衛着自己的階級敵人，任憑着我們的紅軍兵士餓死，還埋伏着襲擊他們，把他們活活打死。

『我們的布丹尼(註二)可算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騎兵領袖了。是一個農村青年——這你知道罷？正同法國革命軍的士兵一樣，他把「大元帥的寶劍」藏在背囊裏，只是他那隻背囊並不在身上却在馬鞍上。他沒有懂得多大的軍事科學的知識，却有着優秀的戰略的本能。他的勇氣差不多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度。他跟他的部下同嘗着極大的困苦，同碰着極嚴重的危險，而他的部下又情願爲他而粉身碎骨。他一身就好像有萬夫之勇了。然而布丹尼和旁的革命軍領袖這一種英勇的精神却不能抵補軍事上技術上我們的缺點，尤其不能挽救我們政治上的估計錯誤——就是對於

(註一)畢蘇斯基 (Pilsudsky) 是波蘭第一任總統，達辛斯基 (Daszynsky) 則是波蘭社會民主黨領袖。

(註二)布丹尼 (Budenny) 俄國革命時代的名將，現紅軍高級將領之一。

波蘭革命的希望。拉狄克（註）曾經預測過這希望會落到怎樣的情形。他警告過我們。那時我很不高興，罵過他中着「失敗主義」的毒。可是就主要的內容說，他的話倒是不錯的。他懂得國外的，尤其是西歐方面的事情，比我們更清楚，他是個人才。他對於我們很有用。前不多時，半夜裏，或者可以說，快天亮了，我們在電話上作了一番長久的談話，彼此便意見一致了。

「你知道對波蘭締結和約這回事起初在黨裏面也會同勃萊斯德·律托夫斯克和約一樣碰到了強烈的阻撓。我因為贊成接受和平條件的緣故，受了劇烈的攻擊。那些條件的確是於波蘭人有利而我們吃虧的。我們的專家們差不多全都主張着：就波蘭的情勢，尤其是那邊一團糟的財政狀態看來，我們只要再堅持些時候，一定可以得到遠更有利的條件的。甚至於我們方面完全勝利的可能性也未必沒有。要是戰爭

（註）拉狄克（Karl Radke 一八八三—）蘇聯政論家，曾任蘇聯中央委員及真理報主筆。一九三

五年，因叛國罪判處徒刑。

繼續下去，東加里西亞以及波蘭境內旁的地方所發生的民族間的仇恨和衝突會使帝國主義波蘭的官軍大大地削弱實力的。那怕德國有金錢和借款接濟着他們，愈來愈大的戰爭負擔和財政困難終究會把工人和農民喚醒的。此外還引了種種情勢來顯示我們應當繼續戰爭來爭取更好的機會。」

『我自己相信』——列寧略略停了一會便重複抽起思想的線索來——『我們的地位沒有逼得我們非出任何的代價來造成和平不可。我們是可以捱過冬天的。但是，我心裏想，從政治的立場倒是現在跟敵人講條件上算；爲苦痛的和平而遭受的暫時的犧牲，在我看來，勝於戰爭的繼續。波蘭人和他們的友人們——一切帝國主義者——所喊出的和平主義口號——不消說，無非是圈套罷了。他們所指望的是藍格爾。』但是我們却要利用着對波蘭的和平把我們的軍隊全都調來對付藍格爾，把

(註)藍格爾(P. V. Wrangel)一八七七一—一九二八)帝俄時代的將軍。革命後曾率領白軍在南俄

羅斯與紅軍對抗。

他打得落花流水，讓我們永遠過着和平的日子。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只有蘇維埃俄羅斯在態度上表示着：牠所以進行着戰爭爲的只是要自衛，要保衛革命；牠是世界上唯一偉大的和平國家；牠沒有要奪取土地，壓迫民族或者進行帝國主義的冒險之類什麼企圖；只有這樣，蘇維埃俄羅斯才能夠勝利。但是最主要的，我們不到絕對確實不得已的地步，我們可應當忍教俄羅斯人民再把戰爭的恐怖和苦難捱受一冬麼？在前綫的我們英勇的紅軍，我們的工人和農民已經忍受了多麼深烈的苦難呵！經過了連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再是一冬的戰爭，那就少不得要有成百萬的人們凍死餓死，而且十分悽慘地死掉了。食糧和布匹已經很缺少。工人們抱怨着，農民們嚙噉着，說我們只是教他們吃着苦沒有拿什麼給他們……不，一想到又一冬戰爭的苦味是受不住的。我們非講和不可。」

當列寧講着的時候，從我的眼睛看去，他的臉龐似乎抽縮了。那上頭深深地刻有大大小小無數的皺紋。每一條皺紋都是用深切的憂慮或者內心的痛苦劃成的。他的

臉上有着說不出的苦難的表情。我感動得發顫了。在我的心目中，我見到中世紀大畫家格魯安華特（註一）所作的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畫了。我記得那幅畫的題字是『悲傷的人』。格魯安華特所作的那幅釘十字架的畫跟吉陀·雷尼（註二）所作的畫裏，那位著名的，一團和氣的仁恕的殉道者——幾多虔誠的老處女和婚姻不幸的婦女的「靈魂的新郎」這兩幅畫是沒有一點類似的形跡的。格魯安華特的基督是「挑着世界的罪惡」，被人們殘酷地弄死的殉道者，受苦受難的人。列寧在我看來，正像這麼一個「悲傷的人」一樣，因俄羅斯勞動大眾的一切痛苦和一切災難而勞瘁而傷心而鬱悶。他不一會就去了。他告訴我的旁的事情有一件就是：密密地綴着鈕扣的皮外套已經定做了一萬套，是給從海上去攻皮萊可柏的那一批紅軍用的。這批皮外套還沒有備好，我們可就接得了可慶的消息，說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千辛萬苦的守衛

（註一）格魯安華特（M. Grünewald）一四七〇——一五二九以後）十六世紀德國的大畫家。

（註二）吉陀·雷尼（Guido Reni）一五七三——一六四二）意大利畫家。

軍在派太柯甫（註）同志出色的英勇的領導之下，已經克復了那個地峽。這是領袖們和軍人方面無比的功蹟。南路前綫也沒有冬季戰爭了。

（註）派太柯甫（Pyatkov）紅軍軍官。

「德國問題」

第二屆世界第三國際和第二國際共產主義婦女大會使我得有機會在莫斯科再停留幾天。天氣熱得很。這固然因為會期恰恰落在六月下旬和七月上旬，正當酷熱的太陽燙着都市上金黃明艷的屋宇的時候，可也多半因為共產主義國際各黨情緒高漲的緣故。德國共產黨裏的空氣特別充滿了電流；會場上天天鬧着風潮。我們中間那些只有自以為辨得出什麼錯失的時候才起勁的悲觀分子們則預言着黨的分裂，黨的末運了。如果關於德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的激昂的辯爭沒有引起別國同志們的熱情來，那麼第三國際該要變成糟糕的國際了罷。「德國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在當時又是共產主義國際本身的問題。

「三月行動」(註) 以及在其根底上的所謂「攻勢理論」——這個雖然直

到後來要證明「三月行動」的正確的時候方纔構成了明確的方式，却是跟「三月行動」不能分開的——使整個共產主義國際不得不考察世界經濟政治的情勢。要為他們的程序和策略，換句話說，要為他們當前的事業，要為勞動大眾的革命動員和革命行動，建立穩固的基礎，這是必要的。

我是站在「三月行動」最尖刻的批評家中間，就因為這並不是工人的鬥爭，却是思想錯誤而準備上組織上領導上都是不行的黨的行動。我對那一種用嘆息和呻吟造成的「攻勢理論」十分用勁地攻擊了一番。此外，我還有私人的問題要解決。德國共產黨領袖們對列華諾意國社會民主黨大會，以及對幹部策略所表示的游移的態度，不由得使我辭去了中央的職務，表示抗議。由於這一個「破壞紀律」的舉動，那些在政治上和私交上跟我最接近的人們，我們俄羅斯友人們該要劇烈地反對我了。

(註)一九二〇年三月甲普事件 (Kapp affair) 以後，德國工人的起事。

罷，我心裏是非常憂悶了。

在幹部裏，在俄羅斯共產黨裏，以及共產主義國際其他許多部門裏，「三月行動」得着不少狂熱的擁護者，他們把這個當作數十萬積極堅決的勞工大眾的革命鬥爭而加以慶賀。他們把「攻勢理論」當作革命的新福音而加以恭維。我知道重大的鬥爭等候着我，於是不管這鬥爭成敗如何，我堅決地打定了主意要把握這鬥爭，依照了共產黨政策的原則來貫徹牠。

列甯對於這一切問題的意見怎麼樣呢？他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理應用在行動上這一種能力是誰也及不到的，他知道在歷史的聯繫上，怎樣來構成關於人和事件的概念，他知道怎樣來測量各種勢力的關係。他贊成「左翼」呢還是贊成「右翼」？當時凡是並不無條件地歡迎「三月行動」和「攻勢理論」的人們是被稱為「右翼」和「社會主義者」的。我急着等候一個不含糊的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這答案對於共產主義國際的存在意義，對於行動的目標和力量該是有着決定性的罷。自從

我離開了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後，我跟俄羅斯友人們的通信聯絡中斷了，講到列甯對於「三月行動」和「攻勢理論」的概念，我也不過從旁聽到了一些傳述和謠言，有的可疑，有的太強調了。我到莫斯科之後不多天，有一次跟他的長談使我獲得了確切無誤的答覆。

列甯首先要我報告德國一般的、和黨內的情勢。我指引了種種事實和數字，用儘可能明晰的客觀的態度，向他勉強地報告了一番。列甯隨時插着嘴，提出問題來，使若干要點更明白，他又隨時下着簡短的批評。我盡情發表了我的意見，說是如果世界大會接受了「攻勢理論」的綱領，那就要使德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國際碰到怎樣的危險。列甯的臉上便浮現了和善的自信的笑容。

『是從什麼時候起，你加入悲觀派的呢？』他問道。『不要愁，攻勢理論不會在大會生根的。我們還在這裏呢。你以為我們不從這上頭來學習，也能夠造成革命的罷？我們也要你從這上頭學習學習。這可以算是真正的理論麼？完全不是，這是幻覺，這是羅』

曼主義，純粹的羅曼主義。正唯如此，所以這是靠着我的老朋友倍拉（註一）的幫助，在「詩人和思想家之國」製造出來的，而倍拉呢，他也屬於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民族，他覺着自己不得不老，是比左派走得還左。我們不應當做詩做夢。如果我們要把握住對布爾喬亞的鬥爭而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冷靜地觀察着世界經濟政治的情勢。我們可以勝利，我們必須勝利。關於共產主義國際的策略以及跟這有關的一切爭點等等，大會的決議必須跟我們對於國際經濟情勢的觀察相一致，並且跟這一種觀察相提並論。兩者必須形成了一體才好。此刻我們對於馬克思，還比對於塔海默（註二）和倍拉來得注意。雖然塔海默也是淵博的好理論家，而倍拉也是優秀的真實的革命家。從俄國革命比從德國「三月行動」更能夠學習得多。我這麼說，我是不怕大會採

（註一）倍拉（Bela Kun）匈牙利共產黨領袖。

（註二）塔海默（A. Thalheimer）德國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一九一八——二三年曾任共產國際中

央委員。

取怎樣的態度的。」

我打斷了列甯的話，說道：『大會對於「三月行動」還得下一個判斷才好，這是「攻勢理論」的成果的實踐，牠的歷史事例。難道理論和實踐是分得開的麼？我還知道有許多同志拒絕着攻勢理論，倒熱切地贊助着「三月行動」。我以為這是不合理的。那些工人們因為霍森（註）所統率的野蠻的一夥激動了他們的緣故進行着鬥爭，想要保衛自身的權利，我們當然是以真切的同情寄與他們的。不管他們的人數是如我們想像上所估量，多到幾十萬呢，還是只有九千人，總之，我們都要宣布着我們自己是跟他們團結在一起的。然而在這樁事件的原則和策略方面，過去和現在，我們的中央所取的態度却是完全不同的問題。這只是革命者的大丟臉，無論用着理論的，歷史的，或者政治的肥皂總是洗不清這樁事情的現實的。』

（註）霍森（Horsing）中部德意志的反動派領袖。

『當然囉，戰鬥的工人的自衛行動，以及對於不大明白事理的黨，或者不如說黨的領導者的攻擊是應當分開來批評的，』列甯很有決斷似的急急地說道。『你們這批反對「三月行動」的人們要怪你們自己沒有那麼幹。你們只見到黨中央的歪曲的政策及其惡劣的效果，沒有見到中部德意志的戰鬥的工人們。不但如此，像保爾·勒維（註）所發表的那一種缺少着對於黨的「一致精神」的完全消極的批評，與其說在內容上，倒是在口吻上更其惹得同志們煩惱的，只有使大家拋開了對於問題的最重要各方面的注意罷了。至於講到大會對於「三月行動」取着怎樣的態度，那你就得認識清楚：最要緊的是打定一個妥協的基礎。不要以為我的話不對，怪着我，和你的朋友們總得把妥協案嚥下去才行呢。在大會上的分贖，你們得到了最大的一份

（註）保爾·勒維（Paul Levi）（一八八三——）一九一九年任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

二四年開除黨籍，改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應該覺着滿意了。你們的政策原則總會博得了勝利，博得了光榮的勝利的。這就可以使「三月行動」不至於重演了。大會的決議非嚴格地來執行不可。督促的責任在幹部。我對於這問題沒有什麼懷疑的地方。

「大會一定會把著名的「攻勢理論」完全推翻，來採取那些合於你的意見的策略的。可是正惟爲了這一個理由，大會也必須拿些安慰的撈什子分散給那些擁護着「攻勢理論」的人們。如果在批評着「三月行動」的當兒，我們強調着說工人們的鬥爭是在布爾喬亞的嘍囉們的挑唆之下進行着，而在一般的態度上，我們又表示幾分老成的「歷史性的」仁恕，這一定是可能的事。你呢，克|拉|賴，可就要以爲這是有關礙的說不行了，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呢？如果大會所定的策略，很快地通過了，而且沒有什麼大磨擦，成爲各國共產黨行動上的領導原則了，那麼我們親愛的左翼分子們就會轉過頭來，不至於過分懊喪的。我們當然首先還應當把黨內黨外真正的革命工人的情緒考慮一番。你從前曾經寫信給我說，我們俄|羅|斯人應當把西歐人的心理研究

得明白些，不要把我们窮相的生硬的方式一下子套在人們的頭上。我注意到這番話了。』列甯滿意地微笑了。

『對呵，我們對待左翼分子不要太硬氣，我們倒要給他們的創口擦些油膏兒。那麼，他們當即會又高興又起勁地跟你們一同來工作，來推行我們國際三屆大會的政策了。因為這意義就在使各派工人來擁護你們的政策，使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動員起來，把他們拉到反抗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裏來。』

『你向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決議案，把大家所要遵循的策略的基礎說得明明白白了。這決議案一點也沒有像保爾·勒維的小冊子那樣的消極性；其中的批評是澈底地積極的。這怎麼會被拒絕的呢？根據着怎樣的議論，怎樣的理由，才可以拒絕這個呢？而你不用積極和消極的差別把你跟勒維分開來，倒不由得站在他們一邊。何等非政治的態度呵！』

我打斷了他的話：『親愛的列甯同志，大約你以為也應當弄些安慰的撈什子給

我吃罷，就因為我少不得要把妥協案嚥了下去。其實就是沒有藥膏兒，沒有安慰的東西，我也能夠把牠嚥下去的。』

『不，』列甯閃避着說，『我沒有這樣的意思。老實說，我要給你一個該受的教訓。請你告訴我，怎麼你幹出這麼重大的傻事來，竟至於脫離中央委員會呢？你的認識在那兒呢？我對於這樁事很氣惱，非常之氣惱。幹得這麼無意識，既不想想這種舉動的影響，又不讓我們知道一點個中的情由，或者問問我們的意見。怎麼你不寫信給齊諾維夫？』怎麼不寫信給我？你至少也該打一個電報來。』

我把自已所以決定了那個主意的種種理由，向列甯說明了一番；那個主意是在當時所遭遇的情勢中間突然形成的。他不肯承認這些理由得當。

（註）齊諾維夫（Zinoviev）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一九三六年，因叛國罪

被處死刑。

「什麼？」他尖着喉嚨叫道，「你不是中央的同志們所委任，却是全黨所委任的？你不應當把那落在你身上的責任丟掉。」因為我還不服氣的緣故，他繼續把我退出中央的事，尖刻地批評了一番，隨即說道：「昨天婦女會議會場上有過一番有組織的對你的攻擊，把你當作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者的榜樣，這可能算是很應得的責罰麼？這就由魯登（註）本人領導着，他參加共產主義婦女工作，我以為，這還是第一次呢。傻原是傻的。你想在婦女會議攻擊着你，就能夠把「攻勢理論」挽救過來的麼？當然囉，還有別種念頭別種希望不免牽涉着。我希望你，從政治的觀點，高高興興地把那一場是非接受下來，雖然滋味不大好。你總得顧念着工人和大眾，親愛的克拉賴。你總得常常想着他們，想着我們所要爭取的目標，化小事為無事。我們之中，誰免得了小麻煩呢？我一遇到總是忍受下去，這你可以相信的。你想你所稱讚的布爾雪維克黨可是一下

(註)魯登(Friesland Reuten)德國共產黨員。

子幹成功的麼？雖是朋友們有時候也不免幹着極不高明的事情呢。再說到你的過失罷。你得答應我：不再幹着這一種輕舉妄動，否則我們的友誼就此結束了。」

這番插話之後，我們的談話又復轉到主要的問題上去。列甯把他對於共產主義國際的策略的意見——這他後來在大會所發表的相關的演說中間提出過；而在委員會的初期討論中間又用簡潔銳利的口吻辯護過——概略地說明了一番：

「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波浪已經退落了。第二次還沒有起來。」他說。「我們在這上頭抱着什麼幻想，那就危險了。我們沒有薛西斯（註）那樣用鏈索鞭着水，使大海揚波的本領。但是堅定意志和注意事實却並不是消極，並不是放棄鬥爭。無論如何不是那樣的意義。學習罷，學習罷，學習罷！行動罷，行動罷，行動罷！要準備，要準備得好，準備

（註）薛西斯（Xerxes）五世紀的波斯國王，曾率海軍遠征希臘而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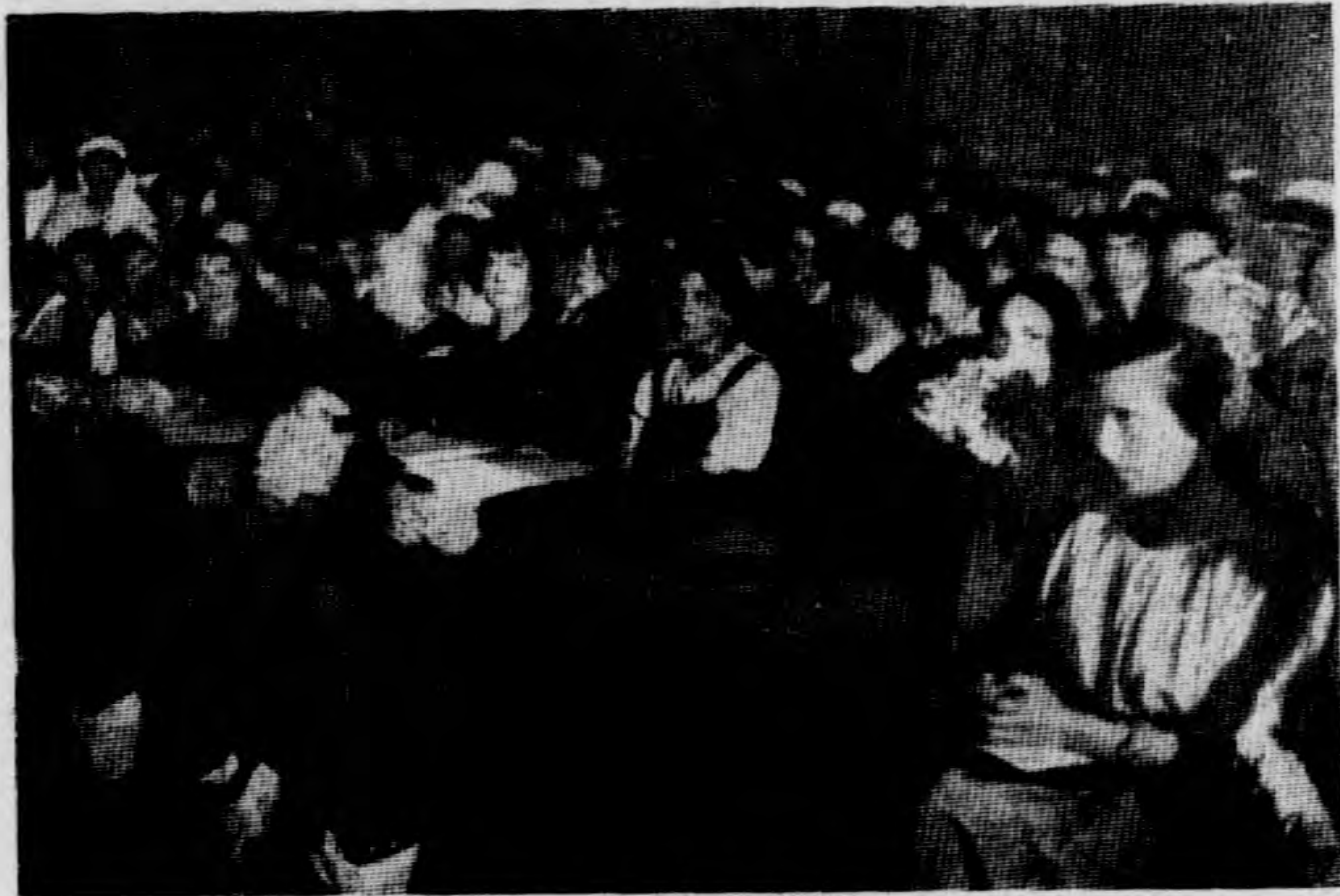
得充分，爲的是等到其次的革命波浪起來，能夠用我們所有的力量意識地充分地來運用牠。這就是我們的工作。黨的行動，從不住的鼓動，不住的宣傳來開展，可是我們絕不妄想黨的行動，得以替代大衆的行動。我們布爾雪維克黨在大衆中間進行了多少的工作，這才我們不由得對自己說道：「我們好容易到得這地步了！前進——那就是向大衆那邊去！當作爭取政權的準備，來爭取大衆罷。」大會方面這樣的態度一定會使你這「反對派」滿意的。」

「還有保爾·勒維？關於他怎麼樣呢？你和你的朋友們的主張怎麼樣？大會對他的態度應當怎麼樣呢？」這問題留在我的舌頭尖已經有好一會了。

「保爾·勒維麼？」列甯回答道。「不幸這成了一個問題了。這所以成爲問題，主要的理由是在保爾自身。他丟開了我們，把他自己孤立起來；他硬要跑到暗弄上去。這從你們在代表中間所做的宣傳工作上，你一定是覺到了的。用不着對我聲辯了。你知道我把保爾·勒維的人格和他的才能估量得多麼高。我在瑞士的時候就認識了他，



金特蔡·賴拉克者著書本



第四屆國際婦女大會



女黨員在農村講演



亞卡斯普魯克 · K · N 人夫寧列



(上) 列寧之妹瑪麗·伊劉尼

雪那學習攝影

(右) 中年時代的列寧夫人

而且有很大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極可怕的患難時代顯得是忠實分子，勇敢，聰明，又沒有自私心。我相信他是跟無產階級牢牢地結合着的，雖然我也覺到他對工人的態度上不免有幾分冷酷。有一種「請你不要走攏來」的神氣。自從他的小冊子發表以後，我就對他疑惑了。我生怕他有着追求清寂和自足的強烈的心情，一種文學的虛榮似的心情。對於「三月行動」的鐵面無情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保爾·勒維所下的批評怎樣？他把黨扯得粉碎了。他沒有批評什麼，他的態度是片面的，誇張的，甚至可以說惡意的；他沒有指出黨應當轉到那一方面去才有益。他缺少着對黨的團結精神。就此惹得各級同志這樣的憤怒，惹得他們全不理睬勒維的批評上不少的真理，尤其是他那些正確的政治原則了。於是引起了一種感情——這也擴張到德國以外的同志們——在這一種感情裏面，關於那小冊子，關於勒維本人的爭執，也就代替了「攻勢理論」和「左翼分子」的錯誤理論和不良舉動，而成爲這次辯論的唯一主題了。他們到了現在已經得意洋洋，非常之得意洋洋了，他們得謝謝保爾·勒維才好。保爾

·勒維呢，他的最大的敵人也就是他自己。」

最後一句話裏的真理，我只有心服，可是對於列甯其他的話，我却爭辯得激昂的。『保爾·勒維不是溫文瀟灑的文人呀，』我說。『他不是要爭政治地位的野心家。他

這樣年青就做了黨的領袖，這是他的命運，不是他的願望。在羅撒、卡爾和里奧（註）

被殺之後，他不得不來接受領導權；這在他是屢次推辭過的。這是事實。即使他對待我們同志們不夠熱情，倒像是一個遁世者罷，我還深信着他的心是隨時隨地跟黨合一，跟工人們合一的。不幸的「三月行動」使他激動得非常厲害。他深信着這樣的攪下去，黨的生命就危急了，而卡爾、羅撒、里奧以及其他那麼多人們也就犧牲得太冤枉了。他一想到黨的損失這麼大，不由得呼號着，痛心疾首地直率地呼號着。他以爲只有用

（註）羅撒·盧森堡（Rosa Luxemburg）卡爾·李普克里希（Karl Liebknecht）利奧·

青吉許斯（Leo Jogisches）都是一九一九年死難的德國革命家。

着最尖銳的方法方才可以挽救過來。他有着傳說上羅馬軍人的精神，情願跳進火坑裏去，以生命的犧牲來挽救祖國，他就用這樣的精神寫成了小冊子。保爾·勒維的用心是極其純潔，毫不自私的。」

「這上頭，我不必跟你來爭辯，」列甯回答道。「你給他辯護，比他給他自己還辯護得好。但是你一定知道，在政治上我們是但問其效果不問其用心的。」到地獄的路用好心舖成」這可不是大家知道的老話麼？大會一定要責備保爾·勒維，要對他不客氣。這是無可避免的。但是責備他，並不是爲着他的那些基本的政治原則，只不過爲着他破壞紀律。正在這當兒，要使大家承認那些原則的正確怎麼辦得到呢？保爾·勒維要回到我們這邊來，是有路可走的，只要他自己不把這條路堵住。他的政治前途操在他自己的手裏。他必須照着守紀律的共產黨員那樣，服從大會的決議，暫時脫離政治的生活。這對於他一定是苦痛的。我同情他，我爲此也有些惋惜。但是在這重大的試驗時期，我却不能挽救他了。」

「這在保爾是必須接受的，正同我們俄國人在沙皇政治之下接受着流刑和徒刑一樣。趁着這一時期正可以勤奮地來研究，靜心地來認識自己。他在年齡上還是青年，在黨裏資格也淺。他的理論上的知識是雜亂無章的，他對於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還只有初等程度。他有了更深切的知識而不變他的原則，一定可以做黨中更好更高的領袖，回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不應當失掉勒維。爲他自己，也爲我們的主義。我們中間人才不見得多，我們必須儘量愛惜着人才。如果你對於勒維的意見是正確的，那麼完全脫離了革命的工人先鋒隊，他就要受到無法救治的創傷了。用朋友的態度去對他說罷！教他不要從他自身算是「正確」的觀點，却從一般的立場來認清事件的本來面目。這上頭，我可以幫助你。如果勒維服從了紀律，態度很好——譬如，他可以匿名地在黨報上寫稿子或者寫什麼小冊子——那麼，等到過了三四個月，我會用公開信來要求恢復他的黨職的。他當前應當經過一次鍛鍊的試驗。我們希望他熬得了。」

我嘆了一口氣。我的心頭爬過了一陣冰冷的感覺，就是我撞着了無可避免的運

命，後果如何是無法豫料的。『親愛的列甯，』我說道，『請你盡力設法罷。你們俄羅斯人是準備好鬥爭的。你們又老是準備好幫人家的忙的。從你們黨的歷史上，我們知道。咀咒和祝頌在你們耳邊來來去去，好像是風吹過了草原一般。我們「西方人」是冷血的。我們負荷着馬克思所謂歷史的阿爾卑。我再懇切地央求你盡力設法使保爾·勒維不至於離開我們。』

列甯回答道：『不要愁。我答應你的話我是會辦的。只要保爾自己站得穩。』

列甯拿起他的帽子，那頂戴舊了的，平常的帽子來，便踏着沈靜有力的脚步去了。

德國代表團裏的「機會主義者們」——瑪爾散，紐曼，法蘭肯，默婁（註）諸同

（註）瑪爾散（Malzahn）紐曼（Neumann）法蘭肯（Franken）默婁（Müller）為出席第三屆

大會的德國代表。

志——急着要跟列甯會見，就他們對於「三月行動」的性質和後果的意見討論一番。法蘭肯同志是從萊因區域來的，其他三人則當作工會代表派來。他們認為極重要的，是就具有階級意識和尖銳的革命性的各業工人所取的態度，向那位公認的共產國際領袖提出一個報告，而且就「攻勢理論」以及他們認為必要的各種策略，表示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自然也急於聽取列甯關於這些問題的意見。在列甯心目中，允許這些同志們的請求是「當然的事」。約定了日子和時刻，他們在我這裏跟列甯會見。德國同志們比他先到好些時候，因為我們得商量停當：怎樣參加大會的辯論。

列甯總是守時的。差不多恰到那一刻，他照例悄然地走進了我們的房間，幾乎沒有給那些正在用心談論的同志們覺察到。「祝你們好，同志們。」他跟他們握了手，便在他們中間坐下來，當即參加着談論。我心中泰然，以為個個同志認得列甯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並想不到要向同志們介紹他。一般的談話經過了十分鐘光景，同志中間有一個把我拉到一邊去，便輕聲問道：「克拉賴同志，請告訴我，那位同志

是誰？」

「什麼你不認得他麼？」我回答道。「這就是列甯同志。」

「可是真的？」我的朋友嚷道。「我原以為他也像什麼大人物一樣，會教我們等候到腳酸的。這位同志真是再樸實再和氣也沒有的了。你該記得我們過去的同志海爾曼·默婁（註）自從做到了部長以後，就穿着燕尾服在國會裏踱步，多麼神氣活現呵。」

在我看來，「反對派」同志們和列甯是在受着相互的考驗。較之「建議式的發言」，列甯更留神於靜聽，比較證實，觀察，可是他也沒有把自己的意見遮掩起來。他不住地問着問題，以極大的興味聽取同志們的講談，不時請求他們解釋或是補充。他最

（註）海爾曼·默婁（Hermann Müller）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一九一九年任外交部長。一九二〇年任內閣總理。

○年任內閣總理。

所注意的是大衆間有計劃有組織的工作的意義，以及集中化和嚴格的紀律的必要。列甯後來告訴我，這次會議使他感覺着大大的愉快。『瑪爾散和他的朋友們所代表的那些德意志工人全是優秀分子呀！我認爲他們在演講競賽上大約是得不到錦標的。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像突擊隊那樣的幹。可是這一點我却十分拿得穩：像他們那樣的人們就是革命無產階級中間組織良好的，穩健的，鬥爭的隊伍，他們就是各工廠各工會的基礎和柱石。我們必須拉攏這樣的分子，使他們積極起來。他們就是我們跟大衆的連鎖。』

來一段非政治性的穿插罷。當列甯訪問我的時候，房子裏一切人就都好像過什麼大節日似的——從守衛着大門的紅軍士兵以至年青的女廚司，不必說從近東和

(註)瑪爾散 (Malzahn) 德國工人運動的組織者。

遠東來的代表們了，大家擁集到我住着的很寬敞的屋子來，這從前本是一個殷富的廠主的產業，革命以後却成爲莫斯科公社的產業了。『弗拉地彌爾·伊里奇已經來了。』消息從這個人傳到那個人。大家跑了出來，有的聚在大廳裏，有的站在門口，迎候着列甯，對他點點頭。當他走到他們的跟前，用溫和的微笑招呼着他們，順便跟這個那個講着幾句話的時候，他們的臉上表現了深切的喜悅。在一方面沒有一點謙恭的形跡，更其說不到奉承，在另一方面也沒有一點賞光，或是矯情的神氣。紅軍和工人，從達格斯頓，和波斯來的職工和大會代表，以及那些穿有好像神怪小說上所描寫那樣服裝的「土耳其斯坦人」——因保爾·勒維而變得很出名的；他們全都把列甯當作自己人似的愛着他，在列甯呢，他也覺着自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們在最暖和的友愛心情中間結成一體了。

在辯論着托洛斯基關於經濟局勢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的報告的時候，在委員

會討論着大會議程的時候，攻勢理論派都沒有博得怎樣的成功。但是他們却還希望着在共產國際的策略的總綱上來幾點補充和修正，從而爭取他們意見上的勝利。這提案由德奧意三國代表團提了出來。脫拉失里（註）附議了，通過與否的問題便惹起了激昂的爭論。應當來一個怎樣的決定呢？極度緊張的空氣充塞了又高又寬敞的克里姆林的大廳，那地方共產主義人民大廈的紅色焰光壓伏了舊皇宮裏冷沈沈的豪華飾金的閃爍。成百的代表們，擠得緊緊的聽衆們，大家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會場的情勢。

列甯站起來發言了。這番演說是雄辯的傑作。修辭的痕跡一點也沒有。就中起着作用的只是明澈的思想的重量，無可動搖的論據的邏輯，以及一貫的堅定的方針。他

（註）脫拉失里（Ferracini）一八九五年——一九三一年，意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二六年被捕，判處徒刑。

所投擲的語句，好像不會琢過的花崗石一般，聚成統一的整體。列甯並不要炫耀人，迷人，他要感動人。他使人感動而且神往的地方不是在美妙的陶醉的詞語，却是在光輝的精神，這一種精神把世間社會現實的現象體會得十分透闢，並且用了鐵面無情的真實性把其真相「直說出來。」列甯的話語落在那些不明致勝的事理而一味以獵逐「右翼」取樂的人們的心頭，好像是鞭子的抽打，棍棒的敲擊。『只消在鬥爭中，我們這邊爭得了勞動階級的大多數——不但是工人的大多數，而且是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的大多數——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真正可以勝利。』誰都感覺着決定的拍板已經拍下了。當我熱誠地跟列甯握手的時候，我禁不住說道：『列甯，你可知道，一般在議論紛紜的會場上發言的演說家就怕像你這樣講得又簡單又樸素？他們生怕這麼着就顯得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夠。我只懂得你的演說術的一方面。這就是托爾斯太的偉大的藝術。你同他一樣，有着堅定，統一而且博大的方針，有着無可動搖的真理感。這就是美呵。這大約就是一種特殊的斯拉夫民族性罷？』

『這我不知道』列寧回答着。『我只知道當我「充當着演說家」的時候，我老是想工人和農民，倒不大想着聽衆。一個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地方演說，必須想到大衆，必須爲大衆說話。但是你這種民族心理的推論倒還是別人不聽見的好，否則他們也許要說：「你看，你看，這位老頭兒受着人家的捧場了。」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使人家疑心到兩個老傢伙打量着什麼主意要打倒「左翼分子。」自然呵，「左翼分子」方面也是沒有什麼陰謀的。』——於是列寧哈哈大笑地離開了大廳，自去辦公了。

在我離開莫斯科的一天，列寧曾經來送別，並且授給我幾個「好教訓。」據他的意見，這些教訓是我「萬分需要」的。

『不消說，你對於大會的結果，並不完全滿意，』他說。『你以爲大會既然贊成着保爾·勒維所遵守的原則和策略，倒反把他擠斥了，是說不過去的，這一層你沒有諱

言。可是這裏也得來修正一下。我所想到的不但是我先前講過的勒維的錯誤。我尤其想到他使我們在實行爭取大眾的策略的時候碰着怎樣的困難。他必須了解而且承認他的錯誤，這才可以從這些錯誤上頭學到些什麼；到那時候他憑着政治的才能，就再可以來領導黨了。」

『我相信，』我回答道，『保爾是有方法可以服從共產國際的紀律，而不至於放棄他個人的意見的。他可以擺脫國會候選人的地位，來出版一個刊物，在這刊物的一期上面，他從十分客觀的歷史觀點探討着我們第三屆世界大會的工作。自然，對於那種工作的批評，也要包括在內。他又來一個宣言，就中說他斷然相信大會對他的決議是錯誤而說不過去的，但是他並不介意，他爲革命運動却要服從那個決議。作爲政治家，作爲個人，保爾·勒維用了這樣勇敢的自主行爲是不至於吃虧，反可以沾光的。他會駁倒反對派的污蔑的謗毀，表明自己是共產主義的先驅。』

『這是出色的主意，』列甯說。『但是可會照辦的麼？無論如何，我希望在對於勒』

維的判斷上證明正確的是你那溫和的樂觀思想而不是其他許多人的悲觀思想。我再答應你爲勒維的恢復黨籍來寫一封公開信，只要勒維自己不搗亂。但是講到問題的主體呢！就全體看來，我們第三屆大會的決議案是很滿意的。這些決議案有着深遠的歷史意義，委實也標示着共產國際的一個「轉捩點」。這些決議案指示着共產國際向革命大衆各黨發展第一期的終結。「左翼分子」以爲世界革命會繼續其初期的暴風雨的速度，以爲革命的第二波浪會捲着我們前進，以爲我們要爭取勝利單是依賴着黨和黨的行動，這種種幻想，大會非加以清除不可的理由也就在此。不消說，要在紙上以及大會廳裏，在脫離了種種客觀條件的空氣中間，使革命成爲沒有羣衆而「只是黨本身的光榮的行爲」是容易的。但是這就沒有一點革命性，只不過是暴徒的概念罷了。「左傾的愚笨」在德國的「三月行動」以及「攻勢理論」中間有了具體的明顯的表現。因此要肅清牠非借你們來出氣不可，你們已經是犧牲者了。但是在事實上，這解決却也是國際性的。

「現在，統一的嚴格的黨決定下來的策略，你們在德國也必須貫徹牠才好。我們所調合的你們雙方之間所謂「和平條約」單是條約本身並不是和平的保障。要是「左」「右」兩方沒有善意和誠意照一個黨那樣來實行明確的政策，那麼條約本身只是空文罷了。因此你儘管不願不肯，你還是非回到中央去不可。而且你又切勿再脫離中央，即使在你個人看來這麼辦是你的權利，甚至於是你的義務。除却在緊要時代爲黨服務，從而也爲工人服務，你就沒有別的什麼權利了。現在你的職責就在保持黨的團結。我要你個人負責注意，不使黨中發生分裂，否則至多也只能以容忍些小小的摩擦。對於那些還未具有深沈的理論知識或是實際經驗的年青的同志們，你必須嚴厲才好，同時你對於他們又必須很忍耐才好。我尤其是要你注意着魯登（弗里蘭）同志。這幾年來，他同我們在一起工作，很好很巴結。他做着柏林「急進派」的領袖，一定是在中央幹部，單從這一點，可以確定「急進派」和中央之間有着更好的關係。假如我認識魯登，他自己一定會覺得因「和平條約」的關係，不得不照同志的模樣，

來跟所謂右派共同工作的，在大會中間我曾經注意到他有一種固執和褻隘的脾氣，這在領導工作上是不行的，領導工作如果一有差失，往往是後患無窮的。」

於是我用了一句驚訝的問話打斷了列寧的「好教訓」：「在這問題上，你可有着什麼疑慮麼？」

我的導師微笑道：「沒有，我有的只是經驗。」於是他接下去說道：「你特別重要的事是幫助那些已經在勞動階級運動裏立了功勳的我們陣營裏幹練的同志們。我正想着亞陀爾夫·霍夫曼、弗立次·蓋恆、陀明、弗里斯（註）等等同志們。你也應當用忍耐的態度對待他們，如果他們間或對於共產主義思想運用得不明澈不精確罷，你不要就以爲「共產主義的純潔性」是受有危險而且喪失了。這些同志們委實是一心要做好好的共產主義者的，你必須從旁幫助，使他們成爲共產主義者才好。當然，對於

（註）亞陀爾夫·霍夫曼（Adolf Hofmann）弗立次·蓋恆（Fritz Geyn）陀明（Dauning）

弗里斯（Fries）德國勞工運動組織者。

改良主義思想的殘餘，你不應當作怎樣的讓步。帶有各種各樣虛假的色彩的改良主義，讓牠偷偷地混進來是不行的。但是你却應當把這類的同志們放在這樣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同共產主義者一樣的演說和行動。雖是這麼辦，說不定你還會感着失望，而且多半會如此罷。如果你失掉了一個再犯錯誤的同志罷，你用了堅定而且聰明的辦法還能夠保住兩個三個十個同志，他們是和你一同走，而且成了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像亞陀爾夫·霍夫曼，陀明等同志們把他們的經驗和偉大的知識帶給黨，且不說別的，他們終究得着勞動階級的信任，他們也就是你和勞動階級之間活的連索了。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就是大衆。或是用了「左翼」的愚笨，或是用了「右翼」的畏怯惹得他們驚慌，那都是不行的。如果在大小事情上，我們老是像始終一致的共產主義者似的行動着，我們就可以爭取大衆了。你們德國人現在應當受一番試驗，就是關於爭取大衆的策略的試驗。不要一開頭就把黨分裂——惹得我們失望呵。永遠想着大衆罷，克拉賴，那麼你才可以走向革命去，同我們一樣：跟着大衆，通過大衆。」

第四屆世界大會

在這次告別的談話以後，我又到過莫斯科，那時因為我不能跟列寧會面談天的緣故，我客中的心情非常黯淡。原來沈重的病痛已經使他那偉大的力量，他身體的抵抗力衰弱了。然而外間的謠言和預測雖然極其慘淡，他倒逐漸地健康起來。一九二二年十月下旬，當我出席第四屆共產國際世界大會的時候，我知道又可以見到列寧了。他的健康恢復到這樣的程度，他要就「五年來的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展望」來作一個報告了。俄國革命的慶祝方式可有更妙於牠的領袖和天才回復了健康，來到革命無產階級前衛代表之前演說這一主題的麼？

我到莫斯科的第二天，那位從舊朝公然投到新時代的看管房子的同志與匆匆地來到我這裏說道：「同志，弗拉地彌爾·伊里奇要來看望你。不消說呵，就是「列寧

「老爺。」他馬上到這裏了。』這消息使我激動得非常厲害，不一會我就完全忘掉「列寧老爺」這個稱呼的幽默了。弗拉地彌爾·伊里奇，他已經到了眼前，穿的是灰色的粗絨外衣，臉色又鮮活又強壯，同病前一樣。

『不要愁。』他回答了我就他的健康狀況的問話，『我覺着十分好，十分強壯。我簡直恢復了醫生們所謂「常態」。我工作着，但是我也顧着自己的身體，嚴格地遵守着醫生們的勸告。多謝你的關心，可是我不再害病了！這是可怕的。我們有多少事情要做，不該再教納台許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和瑪麗·伊劉尼雪那（註）爲我擔心而且麻煩了……我沒有與聞世事，一切還是進行着，在俄國，在其他各地。我們黨中幾位領導的同志大家在一塊兒工作着，成績好得很，這是主要的問題。但是他們要幹的事情太多了，我已不能夠減輕些他們的擔子。』

（註）前者是列寧的太太，後者是列寧的妹子（Maria Ilyinshna）

列寧同志，照他一向跟我會面時候的老樣，殷切地問起我的兒子們，要我就德國現勢和德國共產黨的情形作一個報告。我所陳述的很是簡短，生怕惹得他勞神。我的話似乎就從國際第三屆大會說起。他爲了我在「勒維事件」上所表現的「仁慈心理」對我嘲罵了一番。

『心理學少用心些，對政治多用心些』他說道。『當你跟勒維辯論到羅撒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的時候，你表示過你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你自己要來一下相當的正原，也批評你不得。可是在我們看來，勒維自己的沒落，實在比他意想中他的死敵的沒落更快更無可救藥。他不能再危害我們了。在我們看來，他反正只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罷了。而且即使他在那邊得到了一個什麼地位，我們也認爲他是不能發生多大的作用的。在腐化狀態的那個黨裏得到一個地位並不難。但是在卡爾和羅撒看來，這却是最丟臉的歸宿，是最丟臉也沒有的了。他的退出和他的陰謀不能，也不會使其黨受到深烈的震動或是危險。至多他不過使幾個小部門發生些許磨擦，惹得兩三

個人脫離罷了。黨是健全的，壓根兒健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牠要漸漸兒變成大眾的黨，德國無產階級的領導的革命大眾的黨。」……停了片刻，列寧問道：「還有你們的反對派怎麼樣呢？探討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他們終於明白了沒有？」

我把事情的真相敘述了一番，結末說「柏林反對派」已經打算好利用第四屆國際大會來改變來打消前屆的決議。他們的口號是「回到第二屆大會去。」

列寧對於這一種他稱作「空前的默氣」的企圖覺得很有趣。「那批左翼同志們委實以為共產國際是忠實的裴內洛普（註）呢。」他笑着道。「但是我們的國際却並不是爲了要在晚間拆散的緣故才在日間織布的。進一步再退一步的閑情逸致，在我們的國際決不能容許牠。當前的情勢怎麼樣，難道那批同志們竟看不明白麼？」

（註）據希臘神話，奧特賽的妻裴內洛普（Penelope）在丈夫出征期間，守貞不嫁，天天日間織布，晚

間把織好的布拆散，以資排遣。

界局勢的變化可不是已經使我們不再把爭取大眾當作最切要的工作了麼？這樣的「左翼分子」就好像法國的保皇黨一樣。他們沒有領導什麼，也沒有忘掉什麼。在統一陣綫策略的實行上，我以爲「左翼分子」的批評後面還有把那些策略整個兒推翻的念頭。本屆大會對於第三屆大會的決議不應當加以刪除，倒得加以徵實，加以擁護，堅強地加以擁護。這些決議就是第二屆大會成績的一種推進。我們必須在這些之上來作進一步的經營，否則我們就不會變成大眾的黨、領導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了。我們要不要奪取政權，要不要工人們的獨裁，要不要革命呢？如果是要的，那麼，除却第三屆大會所指出的以外，就沒有別的途徑了。」

在大會期間較後的一個會議，列寧重提到他那一番關於德國「左翼反對派」的議論。其時他參加着德國代表團的一個會議，席上克慝和斐雪（註一）兩同志做着「左翼」的代言人和領袖，提出了他們跟中央幹部以及大多數黨員相反的意思。這

些意見從政治的觀點看來，非常貧弱，而且還出於意料之外，是用極溫和極客氣的神情提出的。雖在全體大會中間，那些「左翼反對派」的態度，比起他們在德國時候那種咄咄逼人的恣肆的態度來，也「溫和」得天差地遠。列寧把頭略略彎着，托在一隻手上，靜聽大家的發言。他沒有參加討論，但有一兩回就反對派的議論，輕輕地發表了幾句意見，也無非表示些同情和同意罷了。那次會議究竟使他得了怎樣的印象呢？偶然碰着他的時候，我向他問到這個問題。

列寧搖搖頭回答道：「唔，在這樣的情勢裏應當有着「左翼反對派」，這我現在十分明白了。當然呵，共產主義勞動黨（註二）的成分多少還剩留着，就是那些有革命感，可是在政治上粗心而且迷惘的不滿足的吃苦的工人們。事情進展得這麼慢，世界

（註一）克恩（König）斐雪（Fischer）德國共產黨員。

（註二）一個左翼的小黨。

歷史似乎並不走得快，而不滿足的工人們却以為你們黨的領袖們並不要牠走得快。他們要你們對世界革命的速度負責，他們嚙噬着，咀咒着。這一切都明白了。但是我還沒有明白像我們聽到那樣「左翼反對派」的領導狀態。」

列寧用了苛刻的諷刺，發表他對「左翼」代表團「女主角」（註）的意見。她把她的事件認為是政治認識不堅定不確實的「個人事件」，結論很生動：『不這樣的反對派，這樣的領導，使我得不到多大的印象。但我老實對你說，像你們這種沒有了解他們，又沒有能力來對付這等搗亂分子的「中央幹部」，也一樣地使我摸不着頭腦。把這批人撤換一下，從他們方面拉回有革命意識的工人們來，給以政治的教育，一定是容易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有革命意識的工人們，而剛才談到的那一種類型的流氓們則是在最糟糕的一種機會主義者的底層。』現在回頭說列寧的來訪罷。

（註）這就指着路斯·斐雪。

蘇維埃·俄羅斯經濟生活的復興雖還緩慢，可是拿得穩了，列寧對這方面表示了滿意。他徵引了那些指示着進步的事實和數字。『但是這個我會在我的報告上來講到的，』他打斷了自己一連串的思想。鐵面無情的醫生所准許的我的訪問時間已經滿了。你瞧，我是多麼守着紀律呵。可是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情，這你一定很愛聽的，我知道。不多時前，我接到一封信，是從老遠什麼地方的小村上來的——（不幸我忘記了那個疙疙瘩瘩的地名——著者）那地方一個教養院裏有幾百個小孩子，他們寫信給我說：「親愛的列寧叔叔，我們要告訴你，我們已經很安樂了。我們在用功學習。我們已經很會讀會寫了。我們做着各種好事情。天天早上，我們把身子洗得干干淨淨，每次吃飯我們總洗一回手。我們要使得我們的教師高興。要是我們身上髒，他就不喜歡我們了。」——這樣的說着說着，你可知道，親愛的克拉賴，我們各方面都有着進步，有着切實的進步呢。我們也是天天在學習文化，在洗淨身子！村裏的小孩子們已經幫助我們建設蘇維埃·俄羅斯了。這麼一來，我們還會怕我們不勝利麼？」列寧微笑了，他那

蒼老的幸福的微笑裏現出勝利的無限的光明來。

我聽過了列寧所發表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演說，也就是爲要經營創造的社會生活，具有要活的鐵的意志的一個久病新愈者的演說，也就是有無情的死神向他伸過瘦削的臂膀去要他的命的一個人的演說。但是連同着他這些最後的歷史性的活動，那最後一次我同列寧的私人談話的煞尾，也還有不可磨滅的影子留在我的記憶裏——且不說偶然碰頭的時候，所交談的那些十分短促的話語。那種種併在一起也就形成了完全的整體。在這裏，在到處，列寧是同樣的列寧。他從小中見大，他在大小事情固有的連繫上推敲小的事情，體味小的事情。他憑着馬克思精神認定民衆教育對於革命是有相互的密切反應的。在列寧看來，民衆教育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民衆教育。他熱誠而又無私地愛着勞動的人民，尤其愛着兒童們，卽未來的這種人民，未來的共產主義者。他的心，他的精神和他的意志都一樣的偉大，因此他成就了無產階級的無

上偉大的領袖。他堅強而有魄力，其所以成爲勝利者，因爲有一個德性主宰着他；這就是對於勞苦大眾的仁愛，對於勞苦大眾的信心，對於濟世的偉大的主義，即他爲之而捨生的主義的篤信，對於主義的勝利的信心。他所以能夠像移去了山嶽似的，成就那歷史的「奇跡」，原因就在此。

婦女、婚姻和性問題

列寧同志時常對我講到婦女問題。他把婦女運動看得非常重要，他認為這是某種環境中間主要的問題，是大衆運動的決定的部分。當然，婦女在社會上的平等是無待共產黨員來討論的一個原則。一九二〇年秋間，在克里姆林的列寧的大書室裏，我們曾經就這問題作過第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列寧坐在他那攤滿了紙和書的寫字檯旁邊，講着研究和工作，沒有顯出一點「天才的不羈」的神氣來。

「我們必須在明白的理論基礎上發動有力的國際婦女運動，」列寧向我問了好，便開始談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不會有好的成績，這是不消說的。在這問題上，我們共產主義者有把主義澈底弄個清楚的必要。我們自己對於其他一切政黨，應當有確切的特點。不幸我們第二屆世界大會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雖然也會提

出過，可是沒有什麼決定。這問題還是在委員會審查中，應當由委員會來起草決議，來確定綱領和方針。可是到現在為止，他們的努力沒有多大的進步。你得來幫幫忙才好。」

我體會了列甯所說的話，便對那種情形，表示了我自己的詫異。對於俄國婦女在革命中間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爲要保衛革命並且使其更加發展而做的工作，我是懷着滿腔的熱情的。至于布爾雪維克黨的婦女同志的地位和活動，在我看來也夠得上算是黨的模範。國際共產主義婦女運動是布爾雪維克黨單獨組織起來的，這種運動包羅着種種有經驗有訓練的有用的實力，創造着歷史的先例。

『這不錯，全都是很忠實很好的，』列甯帶着和藹的微笑說。『在彼得格勒，在這莫斯科，在別的都市和工業中心，革命期間的女工們都有着出色的作爲。要是沒有她們，恐怕我們會得不着勝利，或者難以勝利的呢。這是我的意見。她們當時是多麼的勇敢，現在仍然是多麼的勇敢！她們真是受盡了千辛萬苦。可是現在還是幹下去，因爲她

們需要着自由，需要着共產主義。是呵，我們無產階級的婦女都是優秀的鬥士。她們應該受着大家的讚佩、大家的敬愛。此外，你又不要忘記，雖是彼得格勒「立憲民主黨」的太太們，她們對我們的鬥爭也比較克們（註）更有精神，這是真的。我們黨裏有着幹練可靠，而且不倦地活動着的女同志們。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裏，人民委員會和各種公共機關裏許多重要的職司，我們可以指派這些女同志們來擔任。她們中間有許多人在黨裏面，在無產大眾，農民，紅軍中間，日日夜夜工作着。這對於我們極有價值。對於全世界的婦女也是重要的。這顯示着婦女的能力，她們的工作對於社會的重要價值。第一次無產階級獨裁，是樹立婦女在社會上的平等的真正先驅。這一着掃除着社會的偏見，比許多發揚女權的著作，效力還大。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卻還沒有發動國際的共產主義婦女運動，這是我們必須發動的。這我們必須立即着手來創造。我們沒有

（註）克們（Junkers）指德國資產階級。

國際的婦女運動，我們的國際及所屬各黨的工作就算不得完全的工作，也決不會完全的。但是我們的革命工作却非使其完全不可。請告訴我，國外的共產主義工作怎樣地進行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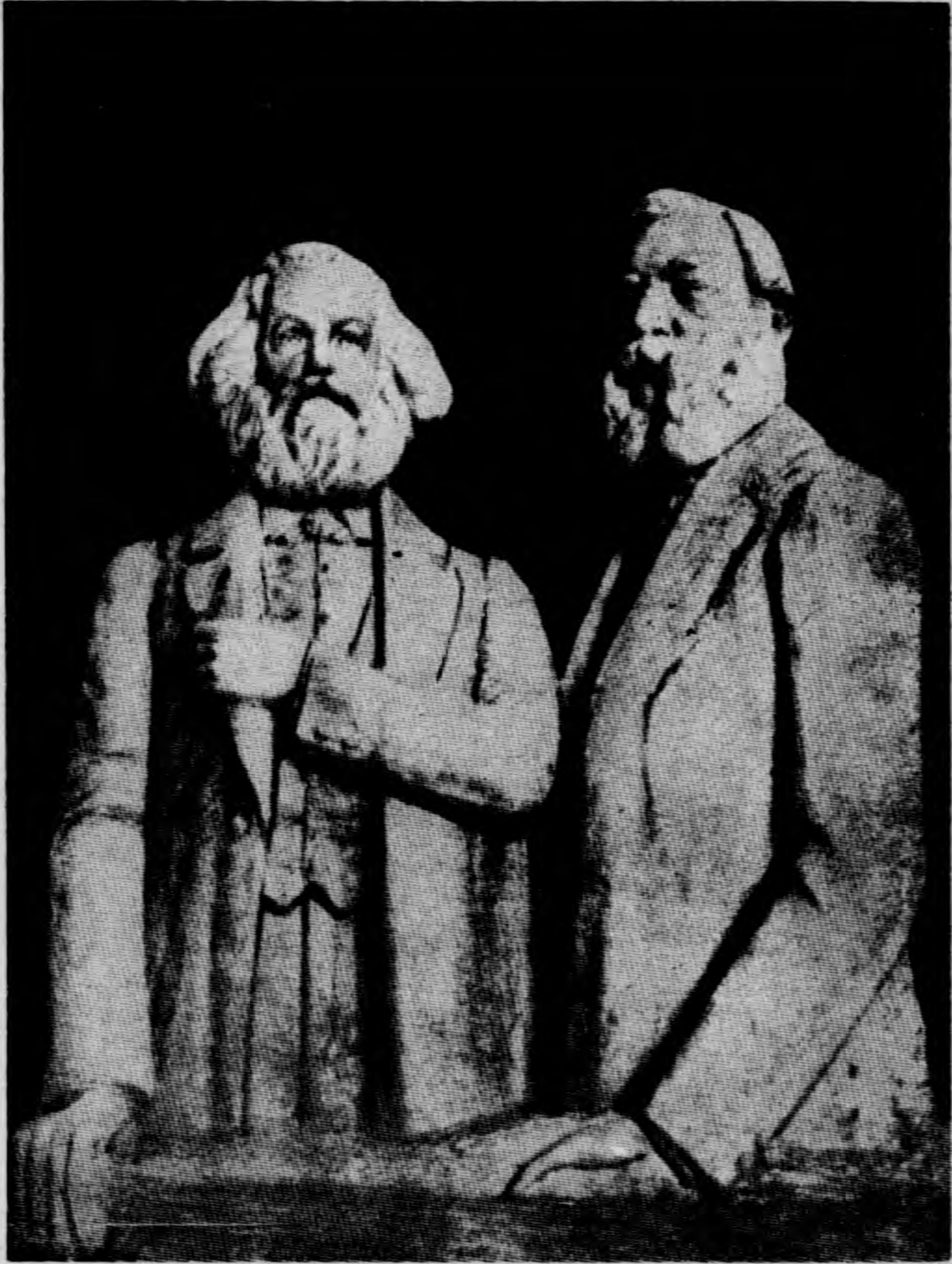
我告訴了他：自從共產國際所屬各黨間的接觸變得很散漫很不規則以來，我所知道的情形。列甯向前微傾着身體，一心一意聽我講；一直聽下去，沒有絲毫厭倦，不耐煩或是疲乏，甚而至于偶然的不適等等形跡。我生平沒有碰到過什麼人像他那樣聽得仔細，像他那樣把聽到的一切很快很快地系統化起來而覺悟到就中的一般關聯。這是從他不時向我突然提出的短短的而往往很確切的問話上，從他把談話中這點那點的細節日後來重複提到的當兒，表示出來的。他講話的時候不多，所講的話又是短短的。

當然呵，我講得特別詳盡的是德國事情。我講給列甯聽：羅撒·盧森堡對於領導婦女大眾作革命鬥爭這回事，是怎樣地加以注重的。共產黨成立以後，她竭力要求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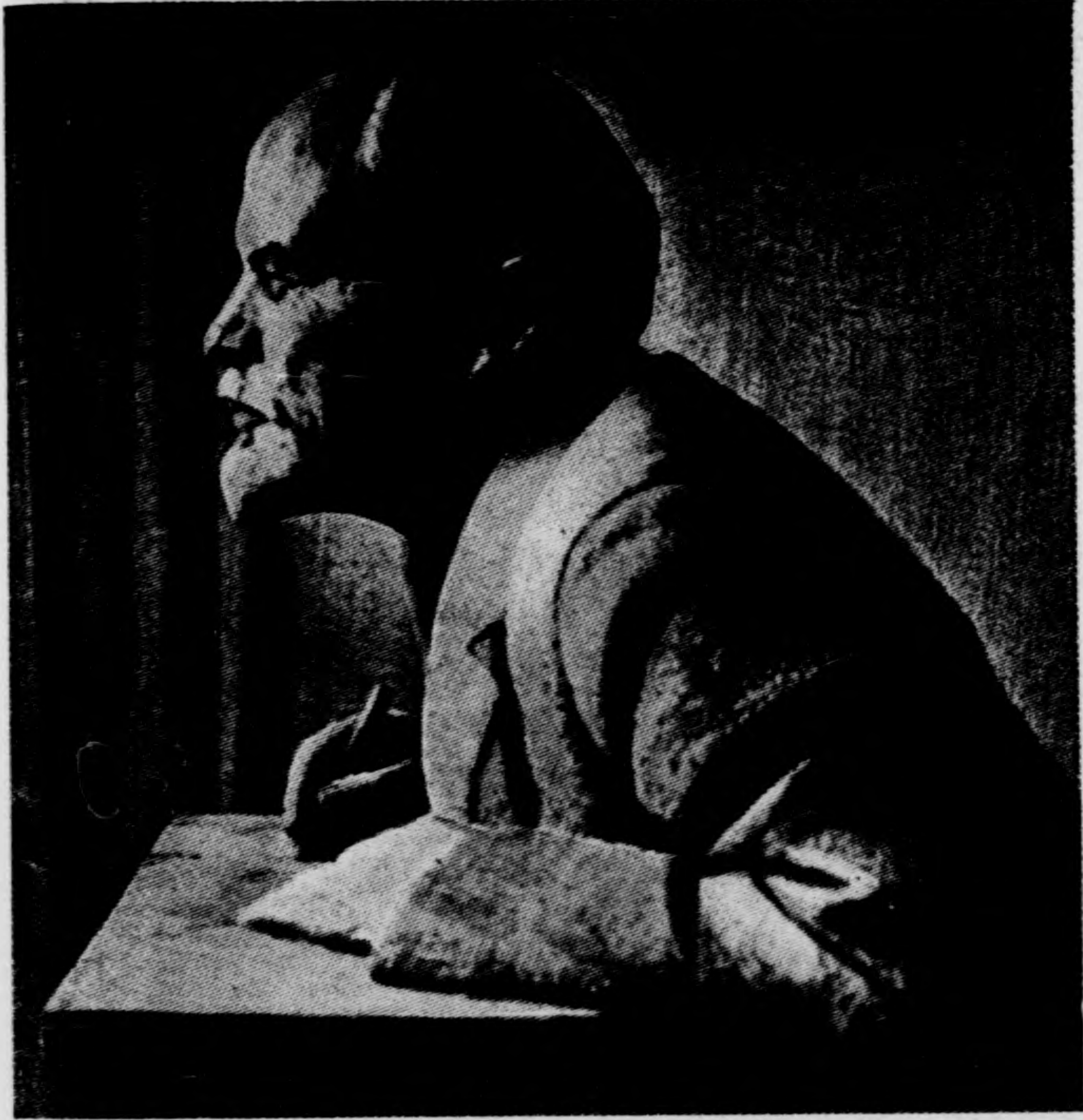
出版一種婦女的報紙。在利奧·約吉許（註）被刺的兩天前，我和他會談的時候，我們討論過黨的迫切的事業，他便把種種的任務轉移到我的身上，其中有一個關於女工中間組織工作的計畫。黨在第一次違禁的會議探討過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例外，那些在戰爭以前和戰爭期間出着風頭的受訓練有經驗的女宣傳家和女領袖仍然是跟社會民主黨在一起，而且覺醒的積極的女工們又是追隨着她們的。然而還有一批能力和意志都很强的女工們結成了一個小小的核心，她們參加着黨的一切工作，一切鬥爭。她們已經在女工們中間組織了經常的工作了。當然，一切事情都還在開始，然而這却是很好的開始。

『不壞，並不壞，』列甯說。『違禁或是半違禁時代女同志們的能力和熱誠，她們的勇氣和智慧正指示着我們工作的發展是有好的前途的。在黨的擴張，黨的力量量的

（註）利奧·約吉許（Leo Jogisches）德國的革命家。



像造斯格恩和思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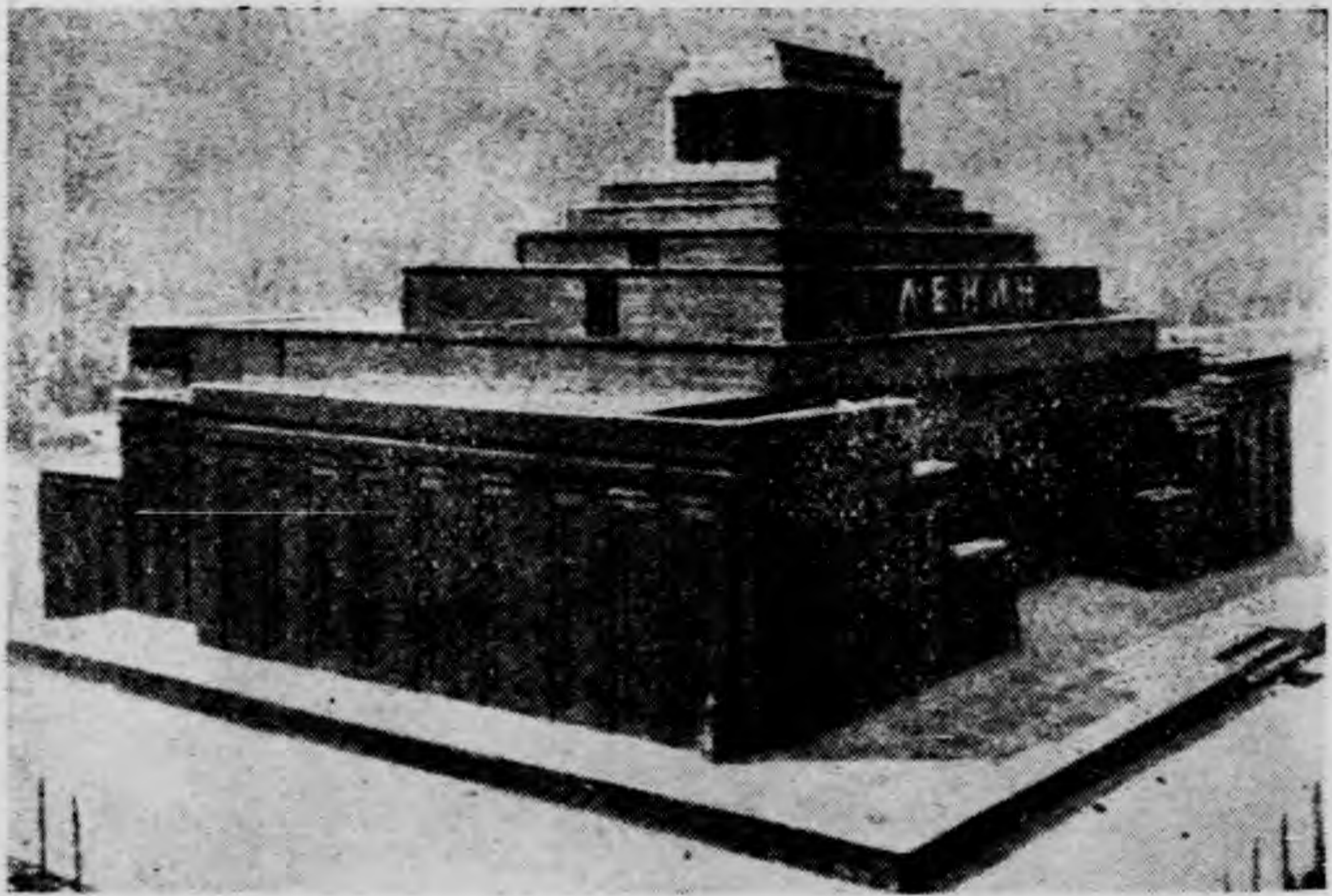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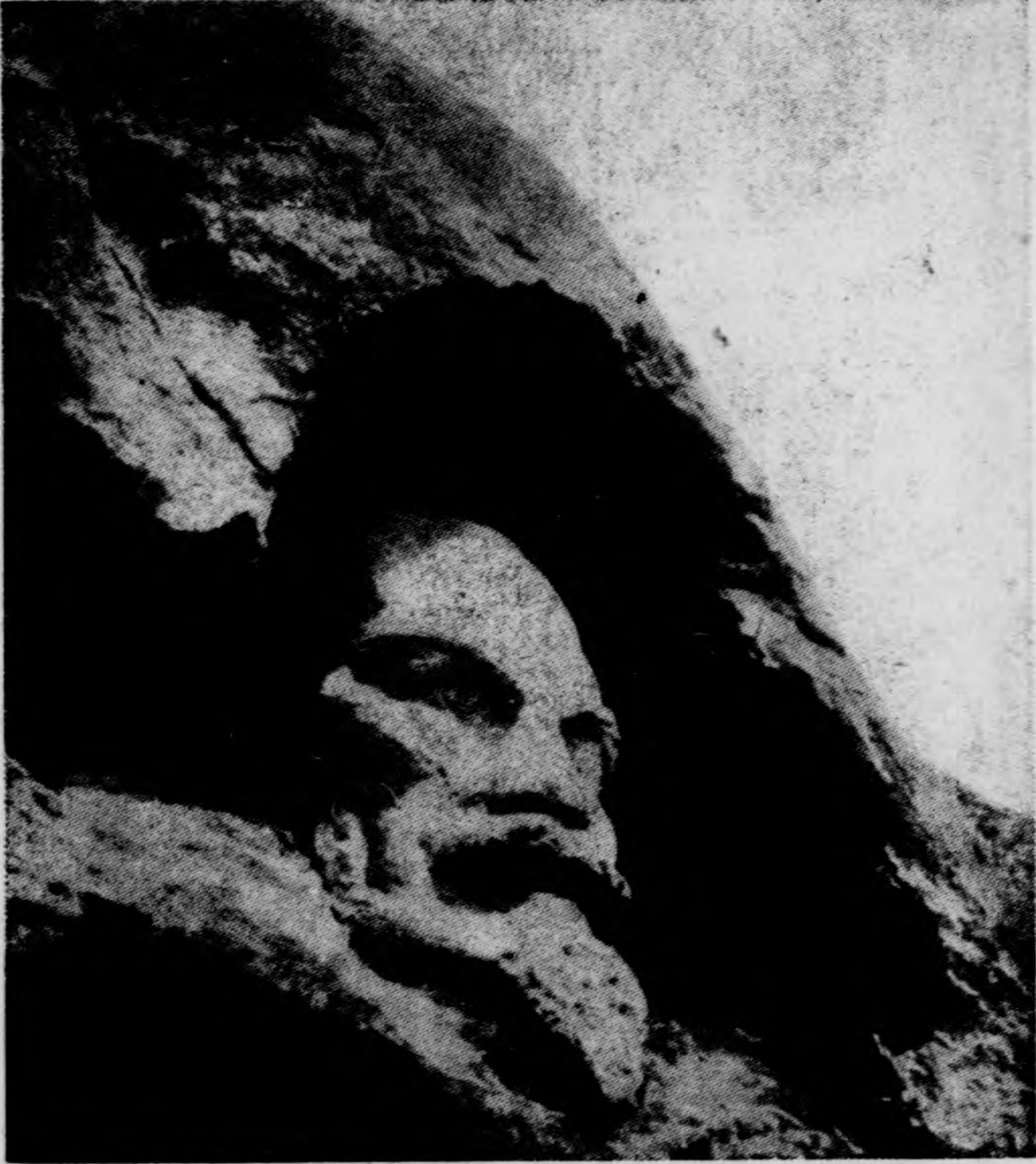
(作夫列特安·N) 像畫寫列



(右) 列寧在病中

(下) 列寧墓





像 寧列 的 成 鑿 石 岩

增加，大衆的爭取，以及我們工作的進行上，她們都是寶貴的因素。然而這些男女同志們對於主義的認識和訓練怎麼樣呢？這對於大衆中間的工作是極其重要的。這對於跟大衆關係密切的事情，對於爭取大衆，喚起大衆熱情的手段都是很有影響的。我一時記不清什麼人說過這樣一句話：誰都應該抱着成就大事業的熱情。我們和全世界的勞動者委實是有種種大事業須待成就呢。因此要問問你看：你們同志們，即德國無產階級婦女的熱情是怎樣發動的呢？她們無產階級的意識怎麼樣？她們的興味，她們的活動可是集中在迫切的政治要求上的麼？她們的思想的主潮是什麼？

「關於這問題，我已經從俄國和德國的同志們那里聽得一些特殊的東西了。我得講給你聽聽。他們告訴我，漢堡有一個幹練的女共產黨員辦一個報紙給妓女看，她要把妓女組織起來，參加革命鬥爭。羅撒的行動和思想正同共產主義者一樣，她寫有一篇論文給妓女們呼籲，說是她們做着那一種可怕的生意的時候，還因為動不動違犯警察條例的緣故失掉了自由。可憐她們在布爾喬亞社會受着兩重的犧牲。第一是

犧牲于布爾喬亞社會裏可咀咒的財產制度，第二是犧牲于那一社會裏可咀咒的道德上的偽善。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有野蠻或是近視的人們才忘得掉這一層。然而如果把妓女們——我怎麼稱呼她們才好呵？——當作特殊的革命鬥爭的部門，來組織她們，來給她們辦一個報紙，那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難道德國真的再沒有別種勞動婦女，可以組織起來，給她們辦一個報紙，應當把她們拉到你們的鬥爭裏來的麼？否則這只是一種病態的發展罷了。這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一種把每個妓女寫成可愛的聖母的文學風格來。這種風格的起原本也是健康的：這就是社會的同情，這就是對於體面的有產者的偽善性的反抗。然而那健康的部分却變得腐化而且墮落了。

『此外，在這里妓女問題又可以引起許多嚴肅的問題來。把她們帶回到生產工作去，把她們拉到社會經濟中間來。這是我們應當幹的事情。然而在我們經濟生活的目前條件之下，在當前一切的環境中間，這麼辦却也是困難而且複雜的問題。你在這上頭就可以看到婦女問題的一方面了，而婦女問題是無產者奪到政權以後擺在我

們面前而要求實際的解決的。這使我們在這蘇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現在再說回到你在德國的地位罷。黨不應該在任何環境之下老是靜靜地站在旁邊看着黨員方面這樣的錯誤行爲。這是造成混亂狀態而分化力量的。至于你自己，你對於這種情形怎麼樣呢？」

我還不及回答，列寧接下去說道：『你們的「罪過」還不止這樣呢。有人對我說，性問題和婚姻問題就是女同志們晚間的讀書會和討論會所探討的中心問題。這些就是政治訓練和教育上有興味的主要問題。我聽到這番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個無產者獨裁的國家被全世界的反革命份子包圍着，德國自身的情勢就需要一切無產者的革命力量儘量的集中起來，摧毀一步步滋長的反革命。然而工作着的女同志們却討論着性問題，討論着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婚姻問題。她們以爲就這些問題來啓發無產婦女的知識是她們最重要的任務了。最風行的作品，我想，就是維也納一個年青的女同志所寫的關於性問題的小冊子了。這是何等的浪費！其中所講的道

理，工人們在倍倍爾（註一）的書上老早就讀過了。只是沒有像小冊子上那樣寫得又嘈囂又雜夾，却寫得尖刻勁健，而且有着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攻擊性。

『佛洛伊德（註二）的學說的發揚似乎是有「教育上」甚至科學上的意義的罷，但其實這却是鑽牛角尖的玩意兒。我不相信那些論文和小冊子等等所講到的關於性的理論，總之一句話，那一種特殊的文學是在布爾喬亞社會骯髒的泥土上發榮滋長的。我不相信那些像印度聖者求道一般，老是探索着幾個問題的人們。那些流行的關於性的理論根本是假定的，而且往往是十分武斷的臆說，那些理論，在我看來是從個人的需要上發生的，這就是在布爾喬亞的道德前面，要證明個人性生活上的變態或是過度的正當，求那一種道德的容忍。這一種遮住了對於布爾喬亞道德的尊重

（註一）倍倍爾（Rebel）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德國社會主義作家，著有婦人與社會等書。

（註二）佛洛伊德（S. Freud）奧地利學者，性心理新學說的創始者。

心的假面具，在我看來，似乎正同鑽在性的事情上頭一樣的討厭。這種行為無論表面上是怎樣的放肆，怎樣的革命，這其實還是非常布爾喬亞式的。這主要是知識分子及其接近的各部門的玩意兒。在黨的中間，在有階級意識的鬥爭的無產者中間，這是什麼地位也沒有的。」

我在這裏插了幾句話，說是在和有財產的布爾喬亞社會裏，性和婚姻的問題含有許多問題，矛盾以及社會各階層婦女所遭受的不少的苦難。戰爭及其後果已經使那種矛盾以及婦女在性問題上所遭受的苦難大大地加深起來，已經使先前隱藏在矛盾和苦難後面的種種問題惹起了人們的注意。此外還加上了革命的效果。感情和思想的舊範疇已經開始動搖了。舊的社會的束縛糾纏着破壞着，于是有了追求男女間新的觀念形態關係的種種傾向。顯現在這些問題上的興味是社會對於文化和改造的需要的表現。這又指示着布爾喬亞社會的虛偽和偽善所引起的反響。婚姻和家族的諸形式，就其歷史的發展及其對於經濟生活的憑藉來說，是足以破除勞動婦女

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永久性的迷信的，對於那些問題的批評的，歷史的態度一定可以進而至于無情地來考察布爾喬亞社會，來揭發其真正的性質和影響，連帶地來指摘其性道德和虛偽。「凡是道路都通到羅馬。」凡是就主要的社會現象，就觀念形態的社會上層構造的任何重要部分所作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一定都通到布爾喬亞社會及其財產基礎的分析，一定都歸宿于這樣的覺悟，就是「這社會非破壞不可。」

列甯笑着點點頭。「得了！你正是給你的女同志們和你的黨辯論着的說客呀。當然，你說的話是對的。然而這不過辯解了在德國犯着的那些錯誤；並沒有證明那些錯誤的不錯。那些是錯誤，仍然是錯誤。你可能真正嚴肅地說得我相信：性和婚姻問題是從成熟的，新鮮的歷史唯物論的立場在那里討論的麼？那是需要着多方面的深沉的知識，需要着最澈底的馬克思主義地運用大量資料的本領的。你們那里找得到所需要的種種力量呢？如果那些力量存在着，那麼像我說過的那種小冊子之類就不會用

作讀書會和討論會的研究資料了。那些東西沒有批評牠，倒是散布着，推薦着。用這一種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枉費心力的方法來探討問題，結果怎麼樣呢？性和婚姻問題是並非當作社會的大問題的一部分來認識的罷？果真如此，那更糟了！大大的社會問題顯得是性問題的一肢一節了。主體的東西變做副屬品了。這不但會使那問題本身弄不明白，而且一般地說來，無產階級婦女的思想，她們的階級意識還因此弄得糊裏糊塗呢。

『算了罷。雖是聰明的所羅門也不由得說一切都有交運的時候。我問問你：現在可是用了怎樣談戀愛怎樣來結婚的討論來教無產階級婦女開心開心的時候？不消說，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世界各國——隨時隨地都離不了所謂歷史的唯物論。現在呢，我們却非把女同志們的思想，勞動大眾婦女的思想全都引向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婚姻和兩性關係上真正的更新的基礎是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創造的。這時候還有旁的各種問題比莫立斯式的結婚或是古代的血族結婚更要緊呢。蘇維埃的問題至今還

是在德國無產者的心頭。還有凡爾賽條約及其對於勞動婦女生活的影響——失業，工資跌落，租稅以及此外許多問題。總之一句話，這麼一種政治的，社會的教育是十分要不得要不得的。對於這情形，你怎麼可以一聲不響的呢？你非用了你的權威來攻擊一下不可。」

我告訴我那憤憤然的朋友：我對於各區領導的女同志們並不是沒有加以批評和勸告。「先知決不爲本國或是本家所承認。」這在他自己也是明白的。由於我的批評，我已經聽受了人們的指責，說是「社會民主黨觀念形態和舊式的頑固思想的渣滓。」然而那種批評終于已經發生效力了。性和婚姻問題不再是討論的中心題材了。然而列甯還是把那一種思緒繼續下去。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說。『我雖然厭惡着頑固，可是在這問題上許多人也以頑固罵着我。這其間有着多少的偽善，多少的褊狹心理。我是平心靜氣忍受着，剛剛啄破了布爾喬亞思想的蛋壳的黃口小鳥兒總是非常聰明的。我們只好讓牠去。講到

青年們對於性問題的態度，青年們對於性問題的過分關心，青年運動也正害着摩登病呢！摩登這句話，列甯冷嘲似的說得格外響，說的時候還露着牙齒笑一臉。有人告訴我，性問題也是你們青年組織中間最愛研究的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演說家想來不見得夠了罷。這樣的錯誤思想在青年運動中間是特別有害，特別危險的。這很容易惹得有些青年在性生活上落到過于興奮和過度，以至于浪費青年的健康和精力。這你也得攻擊一下。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之間，接觸的地方並不少。我們的女同志們非有組織地和青年們共同工作不可。這就是母性從個人範圍向社會範圍的繼續、擴張和昇華。一切覺醒的社會生活，一切婦女活動，都得加以鼓勵才好，她們這才能夠把頑固的個人主義家庭和頑固的家族心理的桎梏拋棄了。這一層且等後來再說罷。

「在我們這里，關於性問題，也有一大部分青年急着要「修正布爾喬亞的概念和道德。」而且，我還得聲明一下，我們一大部分最優秀最有希望的青年就如此。你剛才說的話是對的。在戰爭和革命所造成的條件之下，舊觀念形態的價值消滅了，否則

也可以說，把維繫力失掉了。新的價值則在鬥爭中間慢慢地結成晶呢。在人與人，男與女的關係上，感情和思想逐漸地革命化了。在個人的權利和全體的權利之間，在各個人的義務上，樹立着新的界限。這問題還是在一團糟的醞釀狀態中。在各種矛盾的，傾向上，發展的方向，發展的種種力量都還沒有辨別清楚。這是緩慢的，往往又很苦痛的消長的過程。尤其是在兩性關係，在婚姻和家族的範圍。布爾喬亞婚姻制度的腐敗和糟糕及其所包含的離婚困難，男性自由，婦女的奴役狀態，性道德和性關係上討厭的偽善，這一切使最有積極意志的優秀的人們都不由得要深惡痛絕了。

「布爾喬亞婚姻和布爾喬亞國家的家族法律所造成的束縛力使這些罪惡和衝突只有加深起來。這就是「神聖財產」的力量。這力量使腐朽，墮落，污穢變成了正當。而忠厚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因襲的偽善又推波助瀾。人們開始來抗議瀾漫的腐敗和虛偽了。個人的感情也就起了急劇的變化。每逢強盛的帝國快要崩潰，舊的統治形式快要破滅的時候，每逢整個社會制度快要消滅的時候，人們的欲望以及急于享樂

的念頭是容易轉成奔放不羈的力量。性和婚姻的諸形式，就其布爾喬亞的意義來說，是不滿足的。跟無產階級革命相呼應，性和婚姻的革命漸漸來了。這些新發生的問題所包含的種種所以佔住了青年們和婦女們的心坎，這是容易理會的。在今日性的苦悶之下，他們特別感受着痛苦。他們逞着一輩子憤激的心情反抗起來了。這是我們能夠領會的。天下虛偽的事情再沒有過于對青年們講解僧侶的節慾主義以及荒唐的布爾喬亞道德的神聖了。如果在生理上性慾最顯著的年齡，性慾變成了主要的興味，這尤其是嚴重的事。所發生的影響多麼的可怕呵！這你對列里那（註）同志談一談罷。她在各種教育制度上有着不少的工作經驗，你知道她是澈底的共產主義者，沒有一點偏見的。

『青年們對於性生活問題的態度的轉變是根據于一個什麼「主義」什麼學

（註）列里那（Lina）齊諾維夫的妻。

說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稱自己的態度是「革命的」而且「共產主義者的」。他們老老實實認爲自己的態度是如此。這在我們一般上了年紀的人們是不感什麼興味的。雖然我只不過是陰沉沉的制慾主義者，青年們鬧着的——有時老年的也鬧着的——所謂「新的性生活」在我却往往以爲是純粹布爾喬亞式的，是布爾喬亞審子生活的發揚。無論如何，其間沒有一點跟我們共產主義者所了解的戀愛自由是相同的。你該知道這麼一個有名的學說，就是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性慾和戀愛的滿足有如喝一杯水一般的簡單而且不重要。這一杯水的學說弄得我們的青年們大發其狂了。這就顯得對於許多青年男女是十分有害的。這一學說的信徒們堅持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可是幸虧還有這麼一種馬克思主義，牠直截了當，把觀念形態上社會上層機構的現象和變化全都歸因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問題並不是那樣簡單的呀。這是好久以前，叫做弗里特立克·恩格爾（註）的那位講到歷史唯物論的時候就指出過了。

『我以爲這一杯水學說全然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又是反社會主義的。在性生活上應該考慮的不但是其單純的性質，而且還有文化的特徵，無論那特徵是高級還是低級。恩格斯的起原上指示着：從一般的性慾轉變到個別的性愛的那一種發展那一種洗鍊是多麼的有意義！兩性間相互的關係，並不是僅僅社會經濟和生理上的要求之間，種種力量相激相盪的表現，離開了生理學的本位，用不着研究，而在思想上獨立着的。如果把這些關係上的變化，從其對於整個觀念形態的關聯分離開來，要就這些變化直接追究到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就是合理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了。當然，口渴是應當喝些什麼的。但是平常環境裏的平常人躺倒在地溝上，會喝水溜上滴下來的天落水呢，還是會喝許多嘴唇皮舔得邊上油膩膩的一隻杯子裏

(註) 弗里特立克·恩格爾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德國學者與馬克思共

同創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

的水最重要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喝水當然是個人的事情。可是講到戀愛，就關係着兩個人的生活，也就引起第三個人的，即新生命的問題來了。就是這一層，使社會關心到戀愛，而這種關心又產生了對於社會的責任。

『共產主義者的我，對於一杯水學說是一點兒同情也沒有的，雖然這個學說帶着「滿足戀愛」的好名稱。無論什麼地方，戀愛自由都算不得新，也不是屬於共產主義。你該記得，差不多在上世紀中葉，羅曼主義文學上就把「戀愛自由」當作「心的解放」說過教了。在布爾喬亞的實踐上，這變成了肉體的解放。當時的說教本領比今日高明得多，至於實踐呢，我可不能斷言了。我的意思並不是要用我的批評來提倡制慾主義。這意思一點也沒有。共產主義不會帶了制慾主義來，却帶着生的喜悅，生的權力來，而滿足的戀愛生活則在這上頭可以有些幫助的。然而，據我的意見，目前廣泛的兩性事件的旺盛非但沒有給與人生什麼快樂和力量，反而把這種種奪了去。在革命時代，這是要不得的，很要不得的。』

『年青的人們特別需要着人生的快樂和力量。健身的體育，游泳，賽跑，旅行，各種體操以及多方面的學術興味等等。學習，研究，考察，多多的交際。這種種，比之永恆的理論以及關於性問題和所謂「圓滿生活」的討論，會把更多的東西給予年青的人們。健康的身體，健康的精神！不是和尙或是唐瓊（註），也不是德國頑固分子的中間態度。你認識着年青的——同志麼？一個能力很強的好青年。可是我怕他不會有什麼好成就呢。他幾次三番的鬧着戀愛。這于政治鬥爭，于革命都是沒有好處的。那些把個人的羅曼斯和政治混起來的婦女們，那些追求着異性，老是上了女人家的鈎兒的男子們，他們在鬥爭中可靠不可靠，有耐性沒有呢？我不敢說，不敢說！這是跟革命不對勁的。』

列甯舉起手來，寫字檯上一敲，便在房間裏踱了好一會。

（註）唐瓊（Don Juan）流傳歐洲各國的傳說中的人物，是淫蕩的美男子。

『革命要求着各種力量集中起來，增加起來。從大眾方面，個人方面，像鄧南遮（註）書上男女主人公所慣習那樣放浪的風光，「革命」就受不了。性生活的耽溺是布爾喬亞式，是衰敗的現象。無產階級則是新興的階級。求生活的陶醉，在牠用不着嗎？啡或是什麼興奮劑；色淫同酒一樣，只要一點兒。無產者千萬不要忘記了資本主義的卑鄙齷齪和野蠻。無產者從階級地位，從共產主義理想，承受了最強烈的鬥爭的情緒。無產者需要着清白，清白，第三個清白。因此，我再說一遍：不要軟下去，不要浪費什麼，不要摧毀了自身力量。克己和自制並不是奴隸精神，即使就戀愛方面來說，也不是。但是，克拉賴，請你原諒罷，我談得離開我們談話的起點太遠了。你怎麼不叫我想一條理呢？我講開去講開去，沒了主意了。我深深地關切着青年的前途。青年是革命的一部分呀！如果有什麼有害的傾向出現了，漸漸地從布爾喬亞社會混進革命的圈子去——

（註）鄧南遮（D. Annunzio）意大利近代詩人。

好像許多的野草蔓延着根苗——那還是趁早撲除牠的好。這等問題都是部分的婦女問題。』

列甯談得非常生動，非常有勁。我感覺着他每句話都從心底發出，他那姿態上的表情使我愈益感覺着如此。有時候，一種有勁的手勢使所談的意見強調起來。列甯一面忙着應付緊急而且重要的種種政治問題，一面還這樣周密地注意着分析着種種次要問題。而且所注意所分析的，不但是那些問題在蘇俄的情勢，還有那些問題在資本主義各國的情勢。這在我是非常欽佩的。他正是一個十分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以什麼形式顯現出來的什麼特殊問題，他總是就其跟一般的關係，就其對於全體的意義而加以推敲的。他的生命意志，他的生命目的好像不可抗的自然力一般，不錯亂不動搖，指向着一樁事情：就是要使大眾走向革命的工作加緊加快。因此一切事情，他都就其及于自覺的革命推進力的影響而加以估量。本國的以及國際的都如此。因

爲他對於各國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特點，以及各種各樣的發展階段，都有着充分的注意，所以他眼前老是站立着整個而不可分割的革命。

『真可惜！沒有幾百幾千的人們聽到你這番話，列寧同志。』我嚷道。『你知道，你是用不着說服我的。可是叫友人們敵人們聽聽你的意見，豈不好麼？』

列寧微笑了。『日後我也許要就這等問題講些什麼或寫些什麼——可是現在呢，我不。現在我們的時間和精力都得用別的問題上頭去。更大更嚴肅的困難問題多着哩！要保持鞏固蘇維埃權力的鬥爭遠沒有了結。我們必須渡過對波蘭戰爭所造成的苦難，好好兒來收拾一番。藍格爾還是在南部。然而我倒十分相信不久我們一定解決了他。教英法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各小藩邦操一操心。可是我們的工作，那最困難的部分却還橫在我們的前面——建設就是。講到建設，那麼，兩性關係呀，婚姻呀，家族呀，這種問題就是流行的問題了。總之，無論什麼地方，每逢需要着鬥爭的時候，你總得發動鬥爭。你得留心看着：這些問題是不是用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方式加以探討的？』

這些問題是不是用作分化和陰謀的基礎，現在我終於談到了你的工作了。」

列甯向時鐘瞥了一眼。「我所規定的談話時間已經過了一半了。」他說。「我一直是在閒扯着。關於婦女界共產黨員的工作，你不是要來起草幾個提案麼？你在這方面的主張和實際經驗，我都知道。我們用不着多多的討論。丟開了罷。你想定了怎麼一種提案呢？」

我簡略地說了一遍。說的時候，列甯連地點點頭，沒有插進什麼話來。等到我說完了，我探問着似的看看他。

「我同意的，」他說，「這再同齊諾維夫討論討論罷。如果你能夠在領導的女同志們的會議上報告一番，把這問題提出來討論，那也好的。可惱！真可惱！伊內撒（註）

（註）伊內撒·埃曼特（Inessa Armand）是俄國革命時代在勞動婦女中間最活躍的共產黨員。

現已去世。

沒有在這里。她有病到高加索去了。討論之後，把提案寫出來，由委員會來審查，最後則由執委會來決定。我打算只就幾個要點講一講，這些要點，你我抱着一致的態度，我以為對於我們當今的鼓動和宣傳工作也是重要的，如果這種工作要轉到行動和積極的鬥爭。

『提案上應當明白地指出婦女的真正自由只有經由共產主義才可能得到。婦女的社會的人道的地位，和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兩者有着分不開的關聯，這一層應當有力地說出來。這就在我們的政策和女權論之間畫着一條措不掉的清清楚楚的界線了。如果要把婦女問題當作社會問題的，工人問題的一部分，那麼這一來也可以打定了根底，而把這問題緊緊地連繫到無產階級鬥爭和革命。共產主義婦女運動本身應當是大眾運動，是一般大眾運動的一部分。就中不但是無產者，還有一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資本主義或是別的什麼統治制度之下的一切犧牲者。正惟如此，婦女運動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對於其歷史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才有着意義。就黨

來，說就共產國際來說，我們有着革命女性的花了，這是我們很可以自豪的。然而這還不夠哩。我們必須把都市上鄉村上成千萬的勞動婦女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爭取她們罷，爲了我們的鬥爭，尤其是爲了社會向共產主義形態的轉變。要是沒有婦女，就不能有真正的大衆運動。

「我們觀念形態上的種種概念產生了組織上的種種原則。並不是爲婦女而有什麼特殊組織的。女子做着共產黨黨員，同男黨員完全一樣，權利和義務，男女都平等。在這一點上不能有意見的差別。然而，我們却也不好抹煞一個事實，就是黨必須有種種團體，像什麼工作團，什麼委員會，什麼組，什麼局等等，這些團體的特殊的責任就在喚起工人中間的婦女羣衆使她們跟黨發生接觸，並且長受着黨的影響。這當然包含着她們中間有組織的工作在內。我們所喚起所爭取的那些羣衆，我們必須加以訓練，使他們能夠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無產階級的鬥爭。我想着的不但是在工廠工作或是居家的無產階級婦女。那些窮苦的小布爾喬亞的農家婦女——她們也是資本

主義的魚肉大戰以後更其如此。這些婦女的無政治無社會的落後的心理，她們孤立的活動範圍，她們整個生活態度——這些都是事實。這種事實置之不理是錯的，絕對錯的。羣衆中間的工作，種種特殊的鼓動方法，種種組織的形式，我們必須分別指定各團體去進行。這不是「女權論」，這是切實的革命的方略。」

我對列寧說：他的話給了我大大的鼓勵。關於黨的方面應當設立種種特殊團體以便進行婦女中間有組織的工作，這一個意見曾經給許多同志們，以及工作上很得力的同志們攻擊得很利害。他們用「女權論」以及「向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思想倒退」這等話來「抹煞」這意見。他們爭辯着說：共產主義的政黨，在男女平權的原則上，應當無分男女，在一般的勞動階級中間，一般地工作。男女應當在相同的條件之下，包含在同一的團體裏。列寧所提示的，在鼓動和組織上，對於環境應有的注意，曾給抱着別種觀點的人們認以為有着機會主義者投降和叛離等等性質。

『那並不是什麼新觀點，也不是什麼證明，』列寧說。『你不要上當才好。爲什麼』

我們黨裏的女黨員一向沒有男黨員那麼多——在蘇維埃俄羅斯始終如此呢？爲什麼組織在工會裏的女工的數目這麼小呢？事實是喂養着思想的。對於婦女羣衆中間我們的工作，否認其有設立另外團體的必要，這種概念，同我們那些主義高尚而且最急進的共產主義勞動黨的朋友們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據他們說，組織的形式只好有一個，就是工會。這我知道的。許多有革命性，可是糊塗的人們每逢「缺少着意見」的時候，就求之于主義。換句話說，也就是每逢鬧起思想的門戶來，不讓那些非考慮不可的真正的事實進來的時候。這批「純主義」的保護者怎樣把他們的思想跟落在我們肩頭的空前未有的革命政策的需要搭配起來呢？那一種空談一碰到鐵面無情的需要就粉碎了。要不是有幾千萬婦女同我們一道走，我們就不能行施無產者獨裁，就不能依照共產主義路線來建設了。我們應當尋求爭取她們的塗徑，應當盡力研究，來尋求那一條塗徑。

『正唯如此，我們提出有利于婦女的各項要求來是對的。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

際的所謂「舍本逐末」所謂「改良計劃」這並不是就。此認為我們相信着資產階級統治和布爾喬亞國家的永久性以至于經久性是不對的。這不是用改良來撫慰婦女，把她們引到革命鬥爭路線之外去的一種嘗試。又不是別的什麼改良主義的花樣。我們各項的要求是從切迫的需要，從布爾喬亞社會婦女，沒有防衛能力，又沒有權利那一種可恥的委屈狀態，我們所獲得的實際的結論。我們就此表示着：我們是承認這些需要而且感覺到婦女的委屈和男子的特權的。這我們憎恨着，是的，我們憎恨着一切，我們要廢除一切，這一切凌虐着、壓迫着女工呀，家庭婦女呀，農村婦女呀，小商人的妻女呀，是的，往往還有有產階級的婦女呀！我們替婦女要求于布爾喬亞社會的各種權利和各種社會條例正表示着：我們是了解婦女的地位和利害關係，而要在無產者獨裁之下加以考慮的。當然，不是像改良主義者那樣，要把她們催眠到不會活動，使她們守住一條「總索。」不，當然不，但是也像革命者那樣，在轉變舊經濟和舊觀念形態的工作上，把婦女看作同男子相等的號召起來幹。」

我對列寧說，我自己的確贊同着他的意見，然而這些意見却一定會碰到阻難的。不明白的、胆怯的人們會認為這些意見是冒險的機會主義。而且我們要為婦女界提出的各項要求在實行上表現上會發生錯誤，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這是無意識的話！列寧差不多大發脾氣似的說，『我們做着說着的，一切都
有危險存在着。如果我們因這緣故，就把正確的必要的的事情耽誤下去，那麼我們也許也可以變到印度的苦行僧了罷。不動不動，我們豈不是就能夠對着一根高高的柱子推詳出我們的主義來的麼？當然，我們所關心的不但是我們各項要求的內容，還有我們提出要求來的時候所取的態度。這我以為已經說得也夠明白了。當然，我們不會像數着念珠似的，為婦女界提出我們的要求去的。不，依照當前的環境，我們非今天為這個，明天為那個，天天來鬥爭不可。當然呵，一切鬥爭總是跟無產者的一般利益有關聯的。』

『這樣的鬥爭每一次都足以使我們跟體面的布爾喬亞的親家們做對頭，跟那

些奉承着布爾喬亞也相當體面的改良主義者們做對頭。在鬥爭中間，那些改良主義者要不是在我們的領導之下，和我們共同鬥爭着——這麼辦他們是不願意的——那麼他們就不得不顯出真面目來。換句話說，我們和別黨之間的差異，我們的共產主義都是從鬥爭上產生的。鬥爭使我們可以博得婦女大眾的信任。由于男子的優勢，由于僱主的權力，由于布爾喬亞社會的一切，婦女大眾深感着自身受其剝削，受其奴役，受其壓迫。勞動婦女受盡了欺侮和冷眼，一定會想到非和我們共同鬥爭不可的。

『要不要我再對你賭咒說，關於婦女界，我們爲各項要求而作的鬥爭一定是跟奪取政權，建立無產者獨裁的目標連結着的呢？這就是目前我們的整個方針。這是明白的，十分明白的。然而如果我們提出的老只是那一個要求，那怕我們怎樣的大吹大播罷，勞動婦女也不會情情願願來參加我們爭取政權的鬥爭的。不！一定要使婦女意識到我們的要求和她們自己的苦難，需要和願望有政治的聯繫才好呢。她們必須弄明白無產者獨裁對於她們的意義就是在法律和實際，在家族，在國家，在社會，男女

的完全平等；就是有產者的權力的消滅。」

『蘇維埃俄羅斯指導着她們哩。』我插嘴說。

『那就是我們的主張上偉大的例子了，』列寧接下去說。『蘇維埃俄羅斯是把我們關於婦女界的要求另眼相看的。在無產者獨裁之下，那些要求並不是無產者和有產者鬥爭的目標。那些要求實在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結構的一部分。這就向別國婦女界指示着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切要。這一點差別非明白指出來不可，這才可以使婦女走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中間來。爲了共產黨，爲了共產黨的勝利，最要緊的事情是使得她們明白了解主義，站到堅實的組織基礎上面。但是我們却不可自己騙自己。我們國內各方面對於這問題還缺少着正確的了解。他們站着不動手，而在共產主義領導下的勞動婦女方面，來發動羣衆運動，這一種工作則擺在那里。他們沒有了解這麼一種羣衆運動的發展和管理是全黨的活動的重要部分，黨的一般工作的確有一半就在此。他們間或也承認着：頭腦清楚的，有力量的共產主義婦女運動有着需要，

有着價值，可是這不過是柏拉圖式口頭的承認，他們並沒有把這事情放在心上，認為黨的義務。

『婦女中間鼓動和宣傳等工作，她們的覺醒和革命化是大家當作小問題，當作只跟女同志們有關的事情的。那方面的工作進行得欠缺欠有勁，說起來就全怪着女同志們。這是大錯特錯的！真是斯巴達主義，真是如德國人所說，顛倒的女權論！我們國內各方面這一種不正確的態度，骨子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分析到最後，這不過是對於婦女，對於婦女的工作估計不足罷了。是的，確乎如此！』抓破了共產黨員的皮，就見到粗鄙分子，』現在拿這句話來比方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幸還是確當的。當然呵，講到婦女問題，你非抓破了那最敏感的所在，他們的頭腦不可的。再沒有比男黨員們冷冷的默認更要不得的態度了；他們可不是眼見着婦女們在瑣瑣碎碎的家事上頭，苦得要命，精力和時間全都浪費掉，思想只是退化下去，心力和意志只是衰弱下去麼？當然，我並不講到資產階級的太太們，那些把家事上一切責任，連照顧兒女等等全都

推到僕人們身上去的。我所說的話可以應用到婦女界的絕大多數，就是工人們的妻子，以及在工廠整天站着做工的。

『男子們——甚至無產者中間的男子們——真能知道自己只要在「婦女工作」上幫些忙，就可以省却婦女界好多的心力和困難的，真是少。一些忙也不幫就因為這是違反「男子的權利和品格」的。他們只求着安適。在家庭生活上婦女天天為無數瑣碎事情做着犧牲。男子呢，暗地裏還行施着「老爺」的權利。他的太太也是暗地裏報復着。女子的落後及其不能了解男子的革命思想，只有使男子減退了鬥爭的興致和決心。這等好像小蛀蟲一樣，暗地裏慢慢地蛀蝕着。我知道工人的生活，不單是從書本上知道。我們共產黨的婦女工作，我們的政治工作關係着男子中間的教育工作。我們必須在黨裏，在羣衆中間把「老爺思想」的根苗，連最後最小的一根都拔除了為止。這是我們的政治工作之一，正同造成了男女同志的幹部，理論和實踐上都訓練得很好的，來進行勞動婦女中間的黨務，一樣是迫切的工作。』

關於蘇維埃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情形，列寧回答我的問話道：

「無產者獨裁政府連同共產黨和各工會，不消說是盡心竭力克除着男女大眾的落後思想，摧毀着舊時的非共產主義心理的。在法律上，男女當然有了平等的權利。而且到處可以看出：他們是誠心誠意要實行這種平等呢。我們把婦女帶到社會經濟、立法和行政上來了。一切教育機關都容納着婦女，她們這才能夠增進職業上社交上的能力了。我們建立着公用廚房和公共食堂、洗衣作和修理作；兒童教養院、幼稚園、托兒所以及各種的教育機關。總之一句話，爲要使經濟上教育上家庭的職能轉變爲社會的職能，我們所定的計畫上各要項，我們都在認真地實行着。這一來，婦女就可以擺脫舊家庭的苦悶生活，用不着依靠男子。因而也能夠把各自的才能和志願發展得充分了。孩子們呢，則教養的情形也比在家裏好。我們這裏有着世界上最進步的保護女工的法律，由工人組織所選出的公務員來推行。我們設立着產科醫院、婦孺休養院，女

科診療所組織着關於育兒的講演和展覽會，教導做母親的怎樣照顧自身和孩子們之類。我們盡心竭力維持着失業的、窮苦的婦女的生活。

「我們分明知道：就勞動婦女的種種苦難來想一想，這並不算怎麼了不起，而且爲了她們真正的自由，所應做的事也遠不止這一點。然而，比一比俄國沙皇資本家時代的情形，這却不能不算巨大的進步。就是比之于資本主義還在得勢的各國情形，這也可說是大大的進步。這是方向正確的好好的開端，我們還要盡所有的力量來推進，這你可以相信的罷。我們要是撇開了婦女，就一步也不能前進，蘇維埃國家存在一天，這道理就明白一天。你想，在全國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是小農的這個國家，這多麼難！因爲小農的經濟就是小小的各別的家庭，把婦女束縛着。就這一點來看，你們幹起來該比我們容易得多好得多，假如你們無產階級婦女會抓住了客觀的時機來爭取政權，來革命的話。可是我們也並不灰心。」

「我們的力量跟困難一同增進着。種種事實是會逼得我們來尋求解放婦女大

衆的新方法的。在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協助上，合作該有很大的功效。所謂合作當然是照共產主義者的意味來說，而不是那些抱着叫人嘔心的不革命的熱情的改良主義者所宣傳那樣，布爾喬亞意味的合作。個人的創造力應當跟合作携手並進——那一種創造力是發展而成爲社會活動的。在無產者獨裁之下，由於共產主義的發展，雖在鄉村也可以見到婦女的解放。我在這方面所抱的最高希望是根據於我們工農業的電氣化。電氣化是偉大的工程！實行起來有着大大的困難，非常大的困難。要完成電氣化，必須喚醒了羣衆的最大力量，而加以運用。而且是非有幾百萬婦女的人力來幫助不可的。」

在列寧這番談話的最後十分鐘裏，有人敲門兩下。此刻他才開了門，嚷道：『我就來了。』于是他轉過臉來，笑嘻嘻的再向我說了幾句：『你要知道，克拉賴，我可以借現在跟一個女子談天這樁事來利用一下哩！我可以引證了大家熟知的女性的絮叨來解釋我耽誤時間的理由。雖然這時候講了這麼一大堆的不是女子是男子。可是我還』

「可以做着見證說：你的確能夠十分認真地聽着呢。也許就是這一點惹得我饒舌的呵。」

「這樣的說着笑話，列寧把我的大衣遞給我穿了。『你應當穿得暖些，』他用心似的說。『莫斯科並不是司徒嘉德。你身子應當保重保重。不要着冷。下次再談罷。』他熱誠地和我握手了。」

約莫兩星期以後，我又跟列寧作了一次關於婦女運動的談話。那一次是列寧來訪問我。他的訪問差不多照例是出于我的意料的，這是從萬忙中抽出來的片暇。由于萬忙，列寧顯得很疲乏很擔憂。當時藍格爾敗北的形勢還是沒有判明，而蘇維埃政府又面對着各大都市的糧食問題，有如面對着無情的「斯芬克思。」

列寧向我問起我們的方針或是意見。我告訴他：我們曾經開過一個代表大會，凡是在莫斯科的領導的婦女同志們都參加着，各自發表了意見。所提出的議案現在要

由審查委員會來審查呢。列寧說我們應當注意第三屆世界大會對於這個問題少不得用十分仔細的態度來加以探討。

『只有這一個辦法才可以克服許多同志的偏見。此外，女同志們也應當用強硬的態度來推動。不要像和善的老太太們似的嚕嚕嚇嚇，却得像鬥士似的講得響亮，講得明白。』列寧精神抖擻地嚷道。『婦女在「沙龍」（salon）中出風頭，照羅曼斯上的說法，是要文雅的大會並不是「沙龍」。這是我們依革命的途徑來爭取知識或是行動方法的「角鬥場」。你們顯一顯鬥爭的本領罷。第一，當然是對敵人的鬥爭，然而必要的時候，黨內也應當有鬥爭。我們所探討的是成千萬的婦女。凡是有助於爭取她們的提案和辦法，我們俄國的黨都可以贊助。如果成千萬的婦女不同我們在一起，那麼反革命派說不定會領導了她們來攻擊我們呢。我們應當時刻想到——婦女大眾，我們非爭取了她們不可，無論爭取着的時候，我們會碰着怎樣的困難。』

在那有着強盛急快的搏動的，生氣洋溢的革命中心，我想到勞動婦女羣衆方面，一個關於國際活動的計劃了。『你們那些盛大的黨外婦女會議使我得了一個主意。我們要把這個主意從一國的範圍轉變爲國際的範圍。世界大戰及其後果對於各階級各階層的婦女有着深深的影響，這是事實。他們生活在動亂之中。他們面對着各種爲生活而擔心的問題，這些問題他們大都連夢想也不會夢想過，只有少數人明白着。布爾喬亞社會對於這些問題不能作滿意的回答。只有共產主義能夠這麼辦呢。我們應當使資本主義各國的婦女大衆意識到這一層，因此我們應當籌備一個黨外的國際婦女大會。』

列寧沒有立即回答。他的眸子彷彿轉向着裏邊看似的，嘴巴閉得緊緊的，下唇微突着，他把我的提議考慮了一番。於是他說道：『是呵，我們應當這麼辦。這是一個好計劃。然而好的計劃，即使最出色的計劃，要不是好好兒來實行，也不會有什麼效果的。你考慮過實行的辦法沒有？你對於這問題有什麼意見？』

我把自己的意見詳細地告知了列寧。第一樁事情是各國婦女同志設立一個委員會，經常跟我們國內各部門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並且籌備着召集着代表大會。那委員會是否立即正式而且公開地開始工作是一個還待考慮的問題。無論如何，各委員的第一步工作是在聯絡各方面的婦女領袖——領導着各工會所屬的勞動婦女的，領導着勞動階級婦女的，政治運動的，領導着各種布爾喬亞婦女如女醫師、女教師、女記者之類——的組織的婦女領袖，並且在各國分別設立全國黨外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從各別的全國委員會舉出委員來設立國際委員會，這就籌備着召集着國際大會，並且決定着大會的議程以及開會的時間和地點。

照我的意見，大會首先應當探討婦女對於職業勞動的權利。這包含着失業，因工作平等而工資平等，法定的一日八小時工作制，保護婦女的立法，工會和職業團體，對於產母和小孩的社會保育，幫助家庭婦女和產母的社會制度等等問題。議程上又應當包括着婚姻上和家族法上，以及公共政治的法律上婦女所處的地位。我把這些提

案詳細說明了一番，並且繼續提示着：各國的委員會用了報紙上會場上的宣傳運動就可以把大會籌備得十分周到。這種運動上特別重要的幾點，就是在鼓吹儘量廣大的婦女大衆，勸導她們對於所要商議的各種問題加以認真的檢討，並且把她們的注意力導向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所屬的各黨。這種運動應當推行于各社會階層活動的及勞動的婦女中間；這種運動必須確使各有關團體的代表以及各個公開的婦女會議所推定的代表都能夠在大會出席並且合作。大會必須是一個跟布爾喬亞國會意義迥然不同的「民衆的表現」。

不消說，共產主義婦女在籌備工作上不但應當做着推動的力量而且應當做着領導的力量。我們各部門必須給予她們有力的援助。就國際委員會的工作，大會本身的工作，以及對於這種工作的利用來說，這番話也是適當的。在議程的一切項目上，共產黨的主張和建議案必須提出于大會，必須在原則上毫不含糊而在客觀、上科學上根據于當前的社會條件。這些主張應當由國際的幹部加以討論，加以核准。共產黨的

標語和提議必須做着大會工作的中心，公共注意的中心。大會以後，這些必須儘量傳播于廣大的婦女羣衆中間，必須有助於決定國際婦女大衆的行動。良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不消說就是在各委員會和大會，共產黨的婦女應該堅固地緊緊地聯合起來，照着清楚而且決定的原則，有組織地在一起工作。一個也不讓她從隊伍裏溜掉。

當我談着的時候，列甯往往點頭贊成，或是說一兩句肯定的話。『親愛的同志』，他說道，『我覺得這問題的政治方面以及組織的各主要點，你已經考慮得很周到了。我確信着，在目前的情勢之下，這樣的大會能夠做一番重要的工作。我們就此可以把廣大的婦女羣衆爭取到我們這邊來也說不定。職業婦女呀，工業勞動者呀，家庭婦女呀，教師之類呀，這些婦女羣衆都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是很好很好的！在大規模工業上的糾紛或是政治性的罷工的期間那一種情勢，請你想想罷。加上了有反抗意識的婦女，革命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多麼增大了！呵，當然，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懂得怎樣爭取她們，保持她們，那效益是大的，非常巨大的。可是問題還有幾個。各國政府對於大會的工

作說不定會看得不順眼，會竭力阻止牠。可是我想他們也未必敢用野蠻手段來禁止大會。他們的措置不至于惹得你吃驚的。然而委員會和大會中間，居大多數的布爾喬亞和改良主義的會員，他們定了必然堅強的方針，要來支配共產黨員，這你是不是擔心着呢？而且還有最要緊最後的一個問題。你可當真信任着我們女同志們受了馬克思主義訓練，組成了突擊隊一定會光榮地貫徹了鬥爭的麼？」

我回答着說，各國政府當局大抵不至于對大會採取什麼暴烈的行動。反對大會的種種詭計和搗亂手段該只不過在宣傳上發生些作用罷了。我們共產黨員，一定對付得了非共產黨黨員的人數和勢力，因為我們在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了解和闡明上有着歷史唯物論這一種科學的至高力量，因為我們的各種要求和各種提議都投合着羣衆的心意，又因為我們可以憑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其在婦女解放上的前驅工作。我們對於個別同志的訓練和了解固然不免有着弱點和缺點，然而這是可以有組織的合作和準備來補救的。在這問題上，我想俄國的同志們一定可

以幹得極好。他們一定是我們的陣營的鐵的中心。有他們在一起大會的鬥爭在我是怎麼也不担心的。不但如此，即使我們落了選罷，我們的鬥爭本身也可以把共產主義推進一步，而爲了創造日後工作的機會，這也有着極好的宣傳價值。

列寧哈哈大笑。『你對於一班俄國女革命家，始終是一個熱情者呀。是的，是的，舊時的熱情沒有減退呢。我以爲你是對的。即使經過了一次好好的鬥爭而失敗，也還是一個進步，是對於勞動婦女方面未來勝利的一個準備。總之，這是值得冒險的一樁事情。這上頭我們決不會全盤吃了虧的。當然，我所希望的還是勝利，我從心底希望着勝利。勝利可以使我們的力量有重要的增加，我們的陣綫有大大的擴張和補充，勝利可以把新的生活，新的運動，新的活力帶到我們的隊伍裏來。所以這總是有益的。不但如此，在有產者及其改良主義的朋友們的陣營裏，不安和動搖，各種仇恨和各種衝突也會因大會而激發而增進。你想想那些會跟「革命的暴徒們」聚首一堂的人們，要是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一切順利地進行着——從雪特曼，狄德曼和勒勤（註一）

的陣營出來的忠厚馴良的社會民主黨婦女；教皇給祝了福，或是信奉着路德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們，內閣大臣的女兒們——以及風頭很健的政府顧問，少奶奶式的英國和平主義者，富于熱情的法國女權論者。這樣一個大會所表現的該是怎麼一幅布爾喬亞的混亂和頹廢的畫景呵！怎麼一個布爾喬亞的無用和孱弱的反映呵！這樣一個大會可以加速布爾喬亞的分化，因而減削反革命的力量。敵人的力量減削一點，時就是我們的力量加強一點。大會我是贊成的——這你對葛萊哥里（註二）講一講罷。這一問題的重要，他一定很明白。我們竭力來贊助就是了。發動起來罷，願鬥爭中一切順利。』

• (註一)雪特曼(Sheidemann)狄德曼(Ditmann)和勒勤(Lesien)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註二)齊諾維夫的名(Gregory Zinoviev)

我們接着談到德國的局勢，特別注意于老「斯巴達克斯黨」(註一)和獨立黨(註二)左翼間，未來的「聯合大會」。過後列甯匆匆地走了。他穿過另一房間的時候，他順便向那邊寫着什麼的幾個同志問問好。

齊諾維夫同志也贊成着我的計畫。我興匆匆地着手于籌備工作了。

不幸由于德國和布加利亞女同志們的態度，大會發生挫折了，當時他們幹着俄國以外最好的共產黨婦女運動，可是厭惡着大會。我把這情形告訴了列甯，他回答道：「可惜！可惜！同志們輕易放過了一個出色的機會。要給勞動婦女大眾開闢一條希望的路，從而把她們帶到勞動婦女的革命鬥爭裏，是否再會碰到這樣的好機會，誰知道？打鐵要在燒紅的時候才好啊。然而工作還在着。那些給資本主義拋到了苦境的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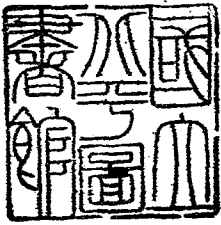
(註一)德國共產黨的前身，李勃克內希和盧森堡所創立。

(註二)獨立社會民主黨。

女，你必須找出一條接近她們的路來。你必須找出這一條路來才好。這是不能避免的一件要事。要是沒有共產黨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大眾活動就不能戰勝資本主義，不能建設共產主義了。這就是到最後婦女所以不能不起來反抗的緣故。」

革命無產階級失去了列甯的第一年。這證明着那位領袖的壓倒一世的天才，他的功蹟的力量。這使我們痛感到我們所遭受的那種浩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隆隆的砲聲淒然地報告着：一年以前，列甯永遠閉住了那雙眼光深遠的眼睛。我看着男男女女勞動的人們排着肅穆的行列，源源不絕地經過了列甯的安息所。他們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好幾千萬人的悲哀。然而從初醒的苦痛的回憶却也升起非常堅強的一個現實來，把悲哀的「現在」消除了。我聽到了列甯對我講的每一句話。我看見了他姿態上的每一變化……列甯的墓前放下了許多旗子，那些用革命戰士們的血染紅了的許多旗子。桂枝的花圈一個一個放下去。沒有一個可說是太多了呢。在花園以外，我

再獻上這幾頁質樸的文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實價國幣四角

憶 列 寧

Reminiscences
of Lenin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著作者

外埠加價五成
Olara Zetkin

翻譯者

胡仲持

出版者

珠林書店

發行者

楊克齋

總發行所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六號
珠林書店

114

78

4/1/20

122030

1/2

